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 1



五四以来 文化名人与祖国

绘画艺术家——齐白石

齐白石（1863~1957），原名齐纯芝、齐璜，号渭清、兰亭、濒生，现代著名绘画艺术大师，湖南湘潭县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8岁进他外祖父办的私塾学堂读书，15岁开始学木匠手艺，16岁改学雕花木工，20多岁就成为湘潭远近闻名的雕花名手。后来，拜萧乡咳、文少可为师，开始学习画像。1889年齐白石结识了胡沁园、王湘琦等文化名人，并专心向他们学习，掌握了一整套中国绘画的技法。1902年，正当壮年的齐白石，胸怀大志离家远游。10年之中，五出五归，足迹遍天下。在旅经历史名城西安时，几位官人劝其用钱捐个“县令”或去觐见慈禧太后，为宫廷服务，都被齐白石一一回绝。1919年，齐白石离别故乡，到北京定居，开始了绘画艺术生涯中的又一个新历程。这期间，齐白石下功夫学习徐渭、石涛、朱耷（八大山人）的绘画技巧，博采革新派画家的神韵和孤傲、冷逸的风格，所以，受到当时一些保守派画家的围攻和排斥。但他始终没有屈服，以勇猛的精神，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坚信三百年后自有公论”。1920年到1929年间，齐白石闭门索居，刻意变法求新，终于摆脱了民间艺术形式中的粗糙繁琐成分，融合了文人画简练隽永的笔法，创造性地以篆法和金石之笔入画，形成了形神兼备的特色和刚劲清新的艺术风格，自创了“红花墨叶”派，被称之为“五绝”的他的草虫鱼虾之作名震海内外。1927年秋，齐白石应邀担任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教授。1928年初夏北洋军阀垮台，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由徐悲鸿担任院长，齐白石仍蝉联执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齐白石眼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践踏，心中充满一种难言的痛苦。1937年，他毅然辞去受敌伪控制的北京艺专的教授职务，在家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等字条，拒绝为敌伪政府的人作画，显露出他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这个时期，齐白石的许多画作都充满着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

全国解放后，齐白石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1950年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把历年自存的精彩作品：篆联、鹰幅，加题了本年的年月和下款，专程呈给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表彰他在发展民族绘画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同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1955年12月11日，德国艺术科学院授给他德国艺术科学通讯院士荣誉状，这是国际间极高的荣誉。1956年4月7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决定把1955年度的国际和平奖，授予齐白石先生，这是在我们中国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人。9月1日，首都隆重举行授奖仪式，郭沫若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向他致以热诚的祝贺和敬意。茅盾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评委会，把奖金授给了他。他当场把所得奖金的一半，长期存入银行，每年所得利息，以“齐白石国画奖金”的名义，作为优秀画家的奖金。1957年中国画院成立，他被选为名誉院长，同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于北京，享年97岁。

向往革命

1863年11月，在湖南湘潭县一个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小村落——杏

花坞，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里，齐白石诞生了。故乡优美迷人的自然景色，象一股清澈的泉水，滋润了齐白石幼小的心田，从此，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是由于他爱他的家乡，爱伟大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大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他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把一个中国人对祖国母亲深沉的爱，画在画里，写在诗里……

那是 1907 年，腐败、黑暗的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6 月，安徽巡警堂堂长、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失败，被捕就义。鉴湖女侠秋瑾以身殉国，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7 月，同盟会发动了黄花岗、惠州七女湖起义，均遭到清王朝的血腥镇压。但是，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布下的火种，已经在广大贫苦民众中漫延开来，使齐白石在漫漫的长夜之中看到了一丝薄薄的光亮。

对革命，他当时的理解是肤浅的。但他坚信，只有革命，才能使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好起来。他当时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斗争的旋涡，然而，他时刻都在关注着形势的发展，革命的命运。

1908 年 2 月间，齐白石应好友罗醒吾之邀到广州游玩。原想在广州略住几天，转往钦州，在罗醒吾的劝留下，他就在广州住了下来，并挂出润格，开始了他卖画、刻印生涯。罗醒吾当时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在广州做秘密革命工作。此次两人在广州见面，罗醒吾悄悄地把革命党的情形和自己的工作状况，详细无遗地告诉了齐白石，并对他说：“必要时还得借重于你，不知你能不能答应。”齐白石一听，微微震动一下。他知道醒吾所说的“借重”是什么意思。“朋友之道，理应互相帮助，何况为了国事，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唯命是从，但不知要我办的是什么事？”齐白石语气坚定，神情严峻。罗醒吾说：“请你传递文件，有困难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别看我整天埋头画画，可是这时局，谁不忧心如焚！我也苦于报国无门啊！”齐白石感慨起来。从此，革命党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罗醒吾都交给他办理。齐白石是利用卖画的名义，把文件夹杂在画件之内，传递得十分稳妥。

转眼到了秋天，齐白石看着罗醒吾比过去更加忙碌了，形势发展很快，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事，使齐白石看到了一缕希望的曙光，心里暗自高兴。

当时，齐白石虽然无法想象未来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但他总觉得要比现在好。不然许多仁人志士为什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之奋斗呢？齐白石向往革命，盼望有朝一日革命成功，使中华民族复兴、昌盛，走向富强。

忧国之忧

1930 年，齐白石度过了 67 岁生日。他迁居北京已经 10 年了。这 10 年是茹苦含辛，艰难奋进的 10 年，是进行“衰年变法”的 10 年，也是他绘画艺术大放异彩的 10 年。

这年夏季的一天，艳阳高照，天气炎热，人们挥汗如雨。齐白石到照相馆，不顾盛夏酷暑，翻穿皮马褂，手里拿着白折扇，照了一张相。并在扇上写道：

挥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御寒，二者须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癫狂。

许多有识之士，从齐白石这帧小照片，看到了他对于世态炎凉的绝妙讥

讽与抨击：已“热”时要防人趋炎附势，已“凉”时要防人落井下石。这里头有他亲身体验的酸、辣、苦、涩，有他的思绪和情感、愤激同感叹。

第二年的秋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袭击沈阳，强占东北三省。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看到侵略者的暴行，齐白石心情十分沉重。重阳节那天，一位友人来邀他去登高。此时此刻，他哪有这种闲情逸致呢？但想到古人登高，原是为了避灾，自己盼望国难早日解除的心情，倒也可以赋予登高以新意。于是，他便和友人一起登上了北京宣武门，从高处极目瞭望，看到炊烟四起，好象遍起烽火，齐白石有说不出的感慨。回到家里，他写了一首诗“莫愁天倒无撑者，犹峙西山在眼前”，以表达对祖国未来的信心。

眼看着日本侵略者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践踏得支离破碎，金瓯残缺，齐白石的心都要碎了。

一天傍晚，他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长长叹了一口气，仰着头对妻子说：“这年月，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要当亡国奴。你知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齐白石语气沉重，“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民国了，大家都盼望着有一个好日子，可是时局一天坏似一天。过去都骂西太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可是现在这不战而降，不是同西太后一路的货！”

1937年，北京沦陷后，齐白石毅然辞去受敌伪控制的北平艺专的教授职务。他常常站在住所的窗前，怅然望着小院中花木凋零的凄凉景象，一股难以言状的悲怆情绪涌上心头。这个时期，齐白石的许多画作都充满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和对敌人的恨。

他画的《鸬鹚舟》上题有“大好河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夫不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在为朋友画的山水卷上题诗道：“对君斯州想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河山。”

不畏强暴

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沦陷后的北京城，夜阑人静，远处不时传来一声声犬吠，给这寒冷的夜晚平添了凄苦、寂寞的气氛。

齐白石久久无法入睡。寂寞的生活，日寇汉奸的困扰，使他的心凉到了极点。这时，门被推开了，来人把一封信递给了他。信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送来的。他拆开一看，原来是学校让齐白石去领配给他的煤。他想，我与艺专已经脱离关系7年了，当今日本人霸占着这所学校，他们为什么配给我这么多的煤，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齐白石当即拿起笔来，写了一封回信，连同通知一起让门人退了回去。并对门人说：“我知道煤不易弄到，可是，我齐白石岂是没有骨气的人！他们真是错看了人，请不动，就来这一套。”

一些敌伪大小头目，时常找齐白石索要字画，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画家，怎能甘心听从那些恶人的使唤？他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等字条。有人为他担心，更有人劝他明哲保身，不要触犯敌伪政权的人。但齐白石无所畏惧，他宁可挨饿受冻，也决不去取媚于那些禽兽不如的强盗。他在诗中写道：“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显露出他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随着抗战的连连胜利，日本侵略者日暮途穷，齐白石心中十分兴奋。他

以老鼠、螃蟹为题材，作画抒怀，借以讽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一幅《螃蟹图》，画面上陷入泥潭的螃蟹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灭顶之灾迫在眼前。他在画上题诗：“处处草泥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岁见君少。”他还充满激情地画了一幅《群鼠图》，画面上，凶残狠毒的日本侵略者被描绘成一群狼狈不堪的过街老鼠，到处挨打，无处可逃。他在画上写到：“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保闹如许？既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炮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

这个时期，他的螃蟹画很多，朋友见他这样，担心敌人借故寻事，劝他多加注意。齐白石不以为然：“我残年遭乱，留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依然这样画下去，进行着自己特殊的斗争。

走进光明

1949年1月31日，历尽苦难耻辱的北京和平解放，古都获得了新生。齐白石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的艺术，他的生命，也获得了新生。齐白石怀着喜悦的心情，提笔画了一幅勃发多姿的《百年青》，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画上的“祖国万岁”4个字倾诉出他对祖国的一片深情。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定北京为首都。中央美术学院聘他为名誉教授。黑暗换了光明，89岁高龄的齐白石眼前一片喜气洋洋，心里有说不尽的舒畅。多年积聚的巨大力量，使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高涨的热情从事艺术创作。一个炎热的中午，齐白石在画案前全神贯注地画了一张又一张，一连画了5幅。大家劝他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再画，齐白石倔强地摇摇头，又挥笔画了一幅《不倒翁》。接着，在画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昨日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作此补充之，不教一日闲过也。”就是凭着“不教一日闲过”的刻苦精神，齐白石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雕花匠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

1950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毛主席派车将齐白石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齐白石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毛主席和齐白石都是湘潭人，从家乡的山水、风俗，谈到他们相识的许多友人的往事，谈到绘画的继承和创新，谈到齐白石的生活和家里的情况，一直谈了几个小时。天渐渐地暗下来，毛主席对齐白石说：“请齐老先生在这里吃晚饭。”晚宴后，齐白石十分感激毛主席给予他这样高的礼遇。临走朱德总司令员亲自送他上车。

回到家里，齐白石把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告诉家人，让他们也分享一份幸福。“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我一辈子见过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不计其数，哪有象毛主席这样诚挚待人、和蔼可亲的？何况他是人民的领袖、国家元首。”他兴奋地说着，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

1951年，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表彰他在发展民族绘画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同年10月，他被推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1957年9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齐白石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同时，《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都刊载了这一消息。

齐白石的艺术，不仅影响了现代中国画，也将对今后中国画的发展起到

巨大作用，甚至还将波及世界艺坛。

（张建一）

实业家教育家——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华侨领袖之一，福建厦门人。1890年随父去新加坡学习经商，两年后，在其父所开设的顺安号任经理，经营米业、菠萝罐头和房地产业。1904年，用7000元贷款开办菠萝加工厂，后又经营橡胶业，获得巨利。1912年回国兴办教育。抗战期间，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反日运动。1938年10月，南洋各界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被推举为难民总会主席，为抗战筹集了数目可观的资金。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员，并利用其身份，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陈嘉庚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层层阻拦，亲自率南洋各界华侨回国慰问，访问了陕甘宁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亲切接见。

解放后，陈嘉庚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主席等重要职务。

陈嘉庚用毕生精力兴办教育，早期在新加坡创办了5所华文中小学校（道南小学、爱国中学、崇福小学、华侨中学和南侨女中），两所中等专科学校（水产航海、南侨师范），资助和帮助过星洲大学、中华女校、南海女中、南洋大学等。1912年，陈嘉庚回到祖国筹办集美小学；1918年创办集美师范学校，同年成立了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学校。他一生倾资办教育，将个人收入用于办学的经费约1000万元之多（相当于现在的一亿美元）。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

他逝世后，在国内银行还有存款300万元，按照他的遗愿，其中50万元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50万元充作集美学校的福利基金，其余200万元仍用于建筑校舍。

陈嘉庚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进步而不断奋斗。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家业家，同时也是一个热忱的教育事业家。他的一生，无愧于毛泽东同志所赞扬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赤子之心

集美社村，这个同美丽的厦门岛隔海相望的海滨渔村，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小学和专科学校的建立，原来不知名的渔村发生了神话般的变化。从此，集美社村同一位伟大的爱国华侨的名字——陈嘉庚连在一起。

1874年10月27日，陈嘉庚出生在闽南海滨集美社村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他从小受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林则徐虎门销烟等爱国故事的熏陶，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陈嘉庚17岁时离别故土，随父亲陈杞柏飘洋过海，到新加坡经商。企业家敏锐的眼光使他最早看到橡胶业的发展前途，由原来经营的菠萝加工业转向经营橡胶种植业。由于他苦心经营，利润额年年成倍增长，获得巨利。

陈嘉庚辛勤耕耘着自己的事业，他努力创造着生活，创造着财富。钱多了，陈嘉庚想的不是享受，而是贫困落后的祖国。他时常对着碧波万顷的大海，眺望水天一色的闽南海滨自言自语：“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他上下求索，一颗火热的赤子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捐资

兴办教育，尽国民一分子天职，为救亡图存贡献一点力量。

陈嘉庚很快拟定了在家乡创办小学的计划。1912年，他回国筹办集美小学，校舍易建，教师难聘。为了解决师资困难，他于1918年3月创办了集美师范学校，同时成立了幼稚园。为了给国家培养其它专业人才，他又在1912年至1921年间相继创办了水产、航海、商业等职业学校。1929年至1932年又增办了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乡村师范等学校。为使家境贫寒的子弟获得求知的机会，学校规定：中学生只交膳食费，学宿费免交，师范生各费均免。学校还给师范、中学生免费发放蚊帐、校服、日用津贴。这样，昔日的渔村奇迹般地变成了海市蜃楼似的集美学村。上课了，集美学校院内书声琅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只只欢快的小鸟，在操场上爬滑梯，荡秋千、打篮球、赛排球……恰似一幅充满春天气息的百鸟图。

1919年初夏的一天，背山面海的厦门岛上，陈嘉庚双手挟腰佇立海边，阵阵海风，不时的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是啊，集美学校的创建，仅仅是这位爱国志士办学救国迈出的第一步。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是有1000万人口的福建，还没有一所大学。为了替祖国培养出高一级的专门人才，陈嘉庚又立志倾资创办福建第一所大学——厦门大学。陈嘉庚和建筑师经过多次勘察，最后把校址选在曾孕育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演武场。这里风景优美，环境幽静，北负青山，面向海洋，地系沙质，平坦坚实，是极为理想的大学校址。

1922年，厦门大学校舍落成。其设备之完善，在当时的旧中国绝无仅有。要维持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大学，谈何容易！学校每月至少要支付3万元的办学费，何况建校期间，他先后拿出了总数300万元的费用，陈嘉庚毕竟没有神话中的宝匣子，所以也就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钱。为了筹款，他忍痛变卖了一部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产业，这对于一个实业家来说，比剜他的心还痛苦。可为了祖国培养人才，个人的利益又算得了什么！不久，他的企业遭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面临着破产的厄运。这时不少人劝他丢掉“集美”和“厦门”这两个“包袱”，但他坚定地表示：个人荣枯事小，贻误青年罪大。企业可以牺牲，学校不能停办！充分表达了他为祖国倾资办学的一颗赤子之心。

支持革命

1910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来新加坡宣传革命，当时年仅36岁的陈嘉庚聆听了这位清贫革命家的演讲后，毅然加入同盟会，并倾囊捐助振兴中华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拍电报给陈嘉庚：“将赴南京需费。”陈嘉庚毫不犹豫地汇款5万元。从那开始，陈嘉庚一直神往着共和国，向往着革命。

1937年7月7日，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序幕，同时，也把南洋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陈嘉庚以赤诚的爱国之心倾资办学，在华侨中享有威望，被大家推荐为难民总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陈嘉庚认为到了唤醒同胞、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时候了。于是，经他积极筹备，在新加坡创办了《南洋商报》，唤起华侨投入轰轰烈烈的反日、反侵略运动。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侨民大会上，陈嘉庚理直气壮地抗议

日本侵略者，致电国际联盟，要求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同时呼吁“国人抱以牺牲之决心，以与暴日抗”，明确提出“全面抗日”、“长期抗日”的响亮口号。他还为抗战筹集了数目可观的资金。

1938年10月，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得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了对日本“和平谈话”，准备投降卖国。他紧急致电痛斥汪精卫的卖国行径，指出对日本乞和，“不特南侨不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中华“民气旺盛，敌决不能之我！”当汪精卫复电坚持卖国主张时，陈嘉庚毅然将电报交南洋各报发表，把汪精卫的卖国阴谋公诸于世。陈嘉庚还巧妙地利用其国民参议员的身份，向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发出“敌未退出我国之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卖国贼”的电报提案。这个提案犹如平地惊雷，震撼了整个会场。30多名国民参议员争先恐后签名。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的汪精卫面色苍白，如座针毡，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大会宣读了这一正气凛然的提案，顿时赢得大多数参议员的赞成拥护，得以很快通过。在陈嘉庚疾恶如仇的提案的揭露下，汪精卫陷入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爱国者的正气压倒了卖国贼的邪气。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赞道：“提案内容，只是寥寥几个大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由于陈嘉庚积极从事抗日爱国运动，新加坡沦陷后，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搜捕的对象。

1940年，陈嘉庚冲破蒋介石集团的重重阻拦，率领南洋各界华侨回国慰问团访问了陕甘宁解放区。在延安，会见了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耳闻目睹了解放区的一切，发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认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公开报告在延安解放区的所见所闻，高度赞扬共产党的英明正确，不禁“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

献身祖国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嘉庚这面“光辉的旗帜”伴随着澎湃向前的历史潮流，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国庆之日，陈嘉庚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当他看到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际歌》和礼炮声中徐徐升起时，他这位在异国他乡饱尝辛酸的“海外孤儿”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他在默默地渴望着祖国强大起来，使侨居在国外的中国人有一座巍峨而又坚不可摧的靠山。

陈嘉庚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全心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主席等重要职务。为团结广大华侨参加祖国建设、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他日夜不停地奔忙着。同时，又把一部分心血继续倾注在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晚年居住在集美社村，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不嗜烟酒，规定每日伙食费不超过5角。国家给月薪300元，他除了每月的伙食费，全部交给集美学校会计处，留作公用。他居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摆着一张旧棕床，一只半旧的写字台，一对不对称的沙发，一套拼凑起来的凳子，两只破旧皮箱，一个用破茶杯做的蜡烛盘，这便是他全部的家档。他像一只春蚕，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振兴祖国的事业，吐尽他最后几缕清丝……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这位历史上最著名的华侨领袖离开了他终身

为之奋斗的事业，与世长辞了，享年 87 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嘱咐亲友：“最要紧的是国家的前途”；建议政府“要下力发展海洋事业”；还将他存在国内银行的 300 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

陈嘉庚先生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这面华侨史上第一面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活动集于一身的光辉的旗帜，将永远飘扬在伟大祖国的上空。

（张建一）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

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原名懋恂，又名立华，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城东五美乡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徐特立4岁丧母，9岁在行医的伯父资助下入蒙馆，15岁时跟一个和尚学习八股文，也读佛家的禅宗语录。16岁由于家境贫困辍学在家，迫于生计，学过中医，学过卜卦。18岁时开始在乡村边教蒙馆，边学八股文，希冀在科举场上取得功名。

1905年，28岁的徐特立在乡村教了10年蒙馆以后，又入了宁乡师范学校学习。由于他各方面的知识都超过了教员，当了4个月的学生后，便被进步教育家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校聘为教员。在这所学校里，他一个人兼教地理、历史、国文、数学等课程，以他渊博的知识，认真的教态，很快就成了长沙很有名气的教师。在教中学的同时，徐特立看到了小学教育的薄弱。为了加强小学教育，他便辞了女校的工作，一心扑在了小学教育的研究工作上。先是入江苏的单级小学教育训练班，后又到了上海等地的小学深入考察，最后又东渡日本参观他们的小学教育。回国后顶着重重困难创办了湖南第一个教育刊物——《周南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徐特立参加了湖南新军的起义运动，并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由于不满一些议员们的腐朽生活和篡夺革命果实的阴谋，便决然辞职。后又被省教育司委任为科长，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几个月便交还了委任状，不耻当了一个小学的校长。1912年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聘为教员，直到1918年。在这里结识了他的一位杰出学生——毛泽东。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在湖南教育界已经有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状，毅然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法国，他一边在工厂做工、替中国工人煮饭，一边在巴黎大学学习。在法国他结交了许多共产党员，接触了许多新事物、新思想。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祖国后，白手起家，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1927年春，参加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协会，提任教育科长兼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底，徐特立赶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52岁的徐特立受党组织派遣，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任江西苏区教育部长。1930年，以58岁的高龄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因而被称为“长征路上的老英雄”。1937年冬，徐特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指导团结抗日力量。1939年回到延安，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建国后，徐特立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委员、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等职。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徐特立一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党中央曾赞扬他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号召全党人民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徐特立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主要著作收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徐特立教育文集》里。

“救亡曾断指”

1907年，软弱腐败的清政府作出一项丧权辱国的决定，准备将几条民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其目的是要把铁路的主权奉送给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

家。听到这个令人气愤的消息后，徐特立立即执笔起草传单，发动了长沙市公立、私立学校师生公开罢课。这是长沙城最早的一次罢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湖南长沙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

事隔不久的一天，长沙市修业学校的操场上，师生们整好了队伍，等待着徐特立作时事报告。当徐特立刚刚走上讲台时，台下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徐特立简单地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作了回顾以后，接着又以近几年发生的教案为例证，讲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洋教士在中国的蛮横无理，以及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割地赔款，致使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不应有的凌辱和屠杀……他越讲越激愤，时而拍案捶胸，时而大声疾呼，时而声泪俱下。台下的师生们都被他那激昂的情绪所感染，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就组织起一支队伍，跟侵略者血战一场。师生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了，徐特立的情绪也达到了极至。忽然，徐特立猛一个转身，跑下了讲台。操场上出现了片刻的宁静以后，便纷纷议论起来。

这时，只见徐特立提着把菜刀又冲上了讲台，双眼闪烁着愤怒的火光，大声喊道：“同学们，为了恢复我中华民族的尊严，我向大家起誓！”一边说，右手一边高高举起了菜刀，只听“叭”的一声，左手的一节手指被砍断了，顿时鲜血淋漓，溅染了衣衫。全场的师生们都被他的举动惊呆了。接着，徐特立用自己的断指，在白纸上写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当校长把这8个鲜红的血字高高举起，展示在师生们面前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呼声在操场上不约而同地响起。

这呼声响遍了湖南，响遍了整个中国大地！

徐特立表现出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以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的誓言。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响应。长沙教育界一些人士聚集在一起，商讨响应的措施。一个实业学校的校长前怕狼后怕虎地首先发了言：“我们赤手空拳，湖北又不派援军，我们怎么个响应法？再说……”

不等这人说完，徐特立便语气激昂地反驳道：“起义响应是革命，革命当然是件难事，这全靠人为。只要我们不怕难，什么东西也挡不住我们的前进。畏首畏尾是成不了什么的！”

10月22日，湖南新军发动起义，徐特立积极参加，并被选为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不久，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官僚势力的代表谭延闿所篡夺，军政府的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谋害。议会内，上自议长下至议员，关心的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看到这种情形，徐特立愤懑万分，毅然决然，辞掉了副议长的职务。那时他认为：只有用教育感化人心，国家才有前途，只有教育才能拯救中国。所以，又重新回到了学校，继续从事教育事业。

“入党在危时”

1919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的徐特立，带领教师积极参加了湖南人民驱逐北洋军阀段祺瑞在湖南的爪牙张敬尧的斗争，因而被通缉。徐特立一方面为寻求知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通缉，于这年夏天筹措了路费，暂离祖国，到法国勤工俭学。

在他回国后的第3个年头的春天（1927年），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农民

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徐特立满怀振奋的心情，积极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并担任了农民协会的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

正当徐特立真正找到救国道路的时候，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配合下，血腥镇压革命工农，残酷屠杀共产党人。仅“马日事变”中，湖南就有 10000 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全国到处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为了不至遭敌人的毒手，徐特立怀着难舍难离的沉重心情，告别了妻子和孩子，踏上了去武汉的道路。离开长沙 20 多里，在一个姓黎的同志家里，徐特立遇到了他 10 年前的学生李维汉。黎家虽是一户大地主，但暗中倾向革命，共产党以此作秘密联络点倒更安全了。师徒此时相见倍感亲切，还没来得及叙谈，外面就响起了一片嘈杂声。二人刚刚躲避到内屋，客厅内便涌进了一批当地的土豪劣绅。

“这下我们又有出头之日啦！”一个得意忘形的声音。

“我看，要一鼓作气，把那些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一个恶狠狠的声音。

“那些跟共产党折腾的穷鬼也不能留下！”一个穷凶极恶的声音。

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语，不时传到内屋师生的耳朵里。外边是歇斯底里的叫嚣，里边是推心置腹的小声谈话。

“老师，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什么看法？”

“蒋介石、许克祥等人镇压革命，罪恶滔天！共产党、工农大众对这笔血债一定要清算！”

“老师，中共湖南省委曾派人找您谈话，不知谈过没有，意思是问问您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都是些年轻有为的人，我都是年过半百的人，还能要我？”

“要，要！您是一位十分坚定的革命者，共产党岂有不欢迎之理？”

“只要共产党不嫌弃我老朽无用，我就坚决要求加入！”

1927 年 7 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许多共产党的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之时，徐特立在武汉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徐特立入党后不久的一天，在汉口的大街上他遇到了过去的一个朋友，二人寒暄一阵后，那朋友试探性地问：“特立，听说您加入共产党啦？”

“对！刚刚加入不久。”

那朋友以关心的口吻劝说道：“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革命失败了，连共产党内部的人有的都脱了党，有的投了降，你还来干什么？给你点钱作盘缠，快回湖南老家吧！”

徐特立听后非常生气，义正辞严地说：“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我们才得干，逃跑算什么？我认为，这时我才真正获得了新生。”

他说着，把钞票扔了满地，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了。

1947 年，徐特立 70 大寿。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坚强的老战士”；周恩来同志的贺词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德同志的贺词是“当今一圣人”。

1968 年，徐特立逝世后，董必武同志写了一首五律诗《挽徐特立同志》，总结了他一生所走过的光辉道路：

晚节全持好，堪为我辈师。

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

亲切长征伴，叮咛小集期。

何图竟永诀？魂梦郁哀思。

（周永祥）

文学家——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号豫才，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里。6岁进家塾，跟从远房祖父玉田读《鉴略》（一本简要的中国历史）。12岁到“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就读，直到17岁。

13岁时，祖父因科场案入狱，继而父亲病死，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为了寻找新的生活，鲁迅于1898年5月离家考入南京水师学堂，次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4年中，他从维新变法中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赴日本留学。次年1月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并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领导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毅然剪掉象征种族压迫的长辫子，并自题小照，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决意做一个民族志士。1904年春，从仙台回到东京和友人许寿裳等提倡文艺运动，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能成功。1909年夏，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并根据生活实感，写了短篇小说《怀旧》。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从1918年起，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发表了第一篇用“鲁迅”作笔名、用白话写成的新小说《狂人日记》。自此，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明天》、《故乡》、《祝福》等小说，从各方面广泛而深刻地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思想，写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的社会历史特点，体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前后，鲁迅写了许多杂文，以“匕首和投枪”的有力的战斗形式，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军阀统治、封建伦理观念及其代表人物。从五四到1926年前后，写出版的作品集有：《呐喊》、《彷徨》、《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和《朝花夕拾》等。

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积极声援进步学生，次年发生“三·一八惨案”，鲁迅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政府誓不两立，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通缉。1926年8月，鲁迅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1927年1月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兼教务主任，期间，鲁迅一直和华磊等共产党员保持密切联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因营救爱国学生无效，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1927年10月起，鲁迅定居上海，从事文艺创作，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是积极的筹备者和领导人。自此，他主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发展无产阶级文学，并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斗争。1931年殷夫、柔石等5位左联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主编纪念专刊《前哨》，先后发表了揭露反动派血腥罪行和痛哀革命烈士的战斗檄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的卖国行径，鲁迅还写了《天上地下》、《中国人民的生命图》、《文章与题目》等文章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鲁迅最后10年间，以特别旺盛的创作精力进行写作，出版了《而已集》、

《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杂文集；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书信集《两地书》以及《集外集》等。他的著作已被译成 50 多种文字，为世界人民所传颂。

鲁迅为人民为革命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但谢绝到国外就医，坚持在中国战斗到最后一息。1936 年 10 月 19 日，病逝于上海，终年 56 岁。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鲁迅很高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人，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一生的业绩永垂青史、光照人间。他的一生和中华民族、和祖国紧紧相连。他的许多动人佳话不知扣动了多少人的心弦。

跨东瀛、寻真理、弃医就文

1902 年 3 月，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了。他的成绩优良：一等第三名。然而，他却感到不安……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1 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与此同时，顽固派则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宣告了温和的改良主义者的彻底失败。作为关心民族存亡和人民命运的爱国志士，鲁迅感到愤慨和忧虑。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古老落后的国家，腐庸政府面对侵略者软弱无能，屈膝卖国，面对人民则置生死于不顾，致使民族衰败，国家危机，民众荼炭，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贪欲却永无止境，在他们的不断掠夺下，广大民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贫困了。

一个严重的“国民性”问题，摆在鲁迅面前，他决定到外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02 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

1904 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以“医学救国”为动机，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选择学医这一专业时，开始他认为“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学得一身好医术可以“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鲁迅这个爱国爱民的善良愿望很快就破灭了。

一次，细菌课演试已经结束，还有一些剩余时间，教师利用它来放映时事幻灯片。就在这次放映的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给沙皇俄军做侦探，正被日本砍头示众，而一群体格强壮的中国人正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看到这里，鲁迅的心狂跳起来，羞辱、痛苦、哀怜、愤怒，一齐涌上心头。他走出教室，回到宿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系列的问号浮现在脑际：究竟应该怎样来救治？用维新运动来改良，走日本之路，清政府改良派的尝试不是失败了吗？靠医学能医治国民思想的麻木和愚弱吗？那幻灯片镜头中跪着被砍头的和站着围观的中国人，何尝瘦弱？他恍然大悟：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官，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善于改变精神的”是什么呢？“文艺！”最需要的是提倡文艺运动！于是，鲁迅毅然决定：弃医就文。1906年7月鲁迅便从仙台回到东京。两年后回到祖国，直至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期间，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以他“空前的民族英雄”的崇高精神和卓绝的实践，成为第一个从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中间站起来的作家。他色彩鲜明地把自己从事的革命文学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密切地结合起来，用文学作武器，为祖国和人民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挥利毫、刺暴虐、真的猛士

鲁迅以他手中的笔作武器，对旧社会的一切黑暗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出击——所向披靡！揭露——体无完肤！他的文章象埋藏在人间地狱中的炸弹，对黑暗社会的崩溃和反动派的灭亡构成了极大威胁，对黑暗的揭露，正是对光明的呼唤。鲁迅的文章，唤醒着麻木愚弱的国民，振奋着觉悟了的民众的心。鲁迅救国救民的思想、精神之火，在他的战斗文章中燃烧着，象星星之火，在广大读者中形成鼓舞人心的燎原之势。

他挥动利毫，将黑暗社会刺得通体鳞伤，把反动制度的暴虐而空虚的本质，洞开于世。他一针见血地把黑暗社会比作“铁屋子”和“人肉筵席”，号召人们“毁灭”它！掀翻它！尽管他明白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他挥动巨笔，划破云层，把曙光透进人间，让人民警觉！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睡熟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却是昏睡入死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子的希望。”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一篇旨在把“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并且震撼了许多“较为清醒的”人，也惊醒了许多正在“熟睡”乃至快要“闷死”的人的扣人心弦的杰作。

鲁迅对黑暗反动势力的揭露，其目的在于斗争和打击之，而且鲁迅是以一员“真正的猛士”的姿态向敌人出击的。他坚决主张：必须象痛打落水狗一样，和一切恶势力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斗争，必须坚持韧性的斗争！尽管大敌当前时，那些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为惶恐，纷纷出来为反动势力辩护，甚至面对爱国学生和蓬勃兴起的群众爱国运动，跳起来骂街，说什么帝国主义是不应该反对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摩）；“打、打！这样的中国人！呸！”（陈西滢）。但鲁迅对这些无耻文人的鼓噪，一方面针锋相对地予以痛斥；一方面冷静地提醒人们“……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要中国好起来，还得做别样的工作！”作为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他的正义言论和行动，使广大人民特别是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和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文化战线上，必须和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屠杀了徒手请愿的群众和青年学生。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立即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对于青年们的横遭惨杀，感到万分沉痛，他把这一个血腥的日子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奋笔疾书，一面痛悼死难的青年，一面斥责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的残忍无耻，他写道：

“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者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之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死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住，打不死了。”

追悼会之后，鲁迅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他写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我住得并非人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

鲁迅自己是这样的“真的猛士”。他化悲痛为力量，奋然而前行了。

交知己、同战斗、丹心向阳

鲁迅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却拥护、支持乃至参与党的正义事业，为党担负过重大任务。他与瞿秋白的挚交，一直被颂为革命者的历史佳话。

瞿秋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从1932年11月到1933年7月，先后曾3次到鲁迅家避难。每当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捕杀革命者，瞿秋白成为敌人的迫害目标而一时无处可去时，总要想起鲁迅，并经常毫不迟疑地说：“到周先生家里去罢！”对鲁迅充满信任。而鲁迅自己早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到上海以后，与党组织、党的领导人及许多党员都发生了亲密的联系，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已成为最亲密、最可靠的朋友。因此，敌人更加怀恨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鲁迅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是十分清楚的，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总千方百计地保护战友。革命者杨志华有一段深情的回忆记述：“难道鲁迅不知道与我们来往是十分危险的吗？他自己所受的迫害已经够多

了，但由于他相信共产主义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对共产党员表现了无限的热情和可贵的友谊。”

其中有一次，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党的指派，去接迎避居在鲁迅家中的瞿秋白——那是1932年上海一个冬天的深夜，陈云在北四川路一路电车的终点站处，迅速地走进鲁迅的住宅，上了三楼。当许广平把他迎进屋里时，瞿秋白已经准备妥善了：将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杨志华的包袱里，另外用一个小包袱装些简单的衣物。和陈云见面后，幽默地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说完回身欲与鲁迅握别。陈云说：“我们去的地方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说着就要下楼去。这时一直站在他们身旁关心地望着他们而不愿打断他们简短的谈话的鲁迅，急忙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完，就叫许广平去了。

鲁迅看了一眼阴雨漆黑的室外，又亲切地注视了一会儿站在身边即将离去的瞿秋白，转而，脸色庄严而显出了忧虑。他很担心他们在路上被侦探巡捕发现。便问陈云：

“深夜路上方便吗？”

陈云略有沉思地回答道：“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

许广平上楼来说：“车子已经雇好了。”

鲁迅和瞿秋白并肩走下楼去，临别时鲁迅带着庄重和忧虑的神情对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就叫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答应着，挥手对鲁迅和许广平说：“你们进去吧。”鲁迅和许广平默默地点点头，目送着3位战友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

说来，鲁迅和瞿秋白原来并不认识，但神交很久。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他看了鲁迅为悼念左联烈士而写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赞叹道：“写得好，究竟是鲁迅！”鲁迅看了瞿秋白以“乱弹”为总名写的一批杂文后，也赞不绝口道：“何苦（瞿秋白的别名）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他’真有才华。”

鲁迅和瞿秋白是在革命的艰难时期，在共同战斗中交为知己的。他们成了最亲密的革命战友。鲁迅曾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从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中，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革命的前途，他完全自觉地把他的毕生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鲁迅从史沫特莱那里得到消息后，便立即与茅盾联名给党中央发了贺信：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勇敢的斗争，你们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这质朴而真诚的语言，饱含着鲁迅一片丹心向阳的真情，表达了他和所有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与信仰。

(周兴椿)

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1882～1982），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经营酿酒作坊的家庭。在他年幼时，随家迁回祖籍嵊县。1899年，马寅初17岁来到上海读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矿冶专业。1906年官费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191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1915年回国。

马寅初1919年4月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20年同郭秉文一起创办上海东南大学商学院（后改为上海商科大学）。1923年成立中国经济学社，任社长，同时被聘为中国银行总司卷（总发行人）。1927年北伐军占领浙江后，遂离北大南下，任浙江省府委员。1928年，先后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的财政委员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来到重庆，创办了重庆大学商学院，并出任院长。由于在报纸上公开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的罪行，于1940年12月被国民党逮捕监禁。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于1942年8月被释后，又被软禁在重庆哥乐山寓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48年底，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被护送到了已解放的北京。

1949年8月，马寅初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开国大典。历任全国政协一届、三届委员，二、四届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五届代表、常务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51年6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因发表《综合平衡论》和《新人口论》受批判，于1960年3月辞职离开北大。1979年9月恢复名誉，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0年9月补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82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马寅初一生为新中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生发表的论著近400篇（种）。解放前的主要著作有：《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经济学概论》、《战时经济论文集》等14种。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和政治界都有一定影响，特别是《战时经济论文集》，揭露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囤积居奇、搜刮民膏、发国难之财的罪行。解放后发表论文40多篇，为国家经济建设、财政收支、物价稳定、团结改造工商业者等问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50年代中期提出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国难当头，我决不离开祖国”

1906年，24岁的马寅初在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官费留学。留美期间，他受西方经济的启示，深深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在社会制度、管理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他怀着富民强国的远大抱负，毅然改行攻读经济学。1915年马寅初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一些军阀、政客纷纷以重金进行收买、拉拢，以使为其服务。然而，马寅初根本不为金钱所动，一概回绝，却欣然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到了北大任经济学教授。他一边讲学，一边到上海等地进行经济考察，并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全心全意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寅初怀着既悲痛又愤恨的心情来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在陪都，他一面在重庆大学商学院教书，一面致力于战时经济的研究。在研究中，马寅初掌握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不顾民族危亡，大发国难之财的第一手资料，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之情。为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存亡，他置个人的利益、生命于不顾，或是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或是演讲，公开揭露“四大家族”的罪行。他尖锐地指出：“四大家族”是当今中国的“大财神”，他们“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其手中”，借日本人侵略我们之机，“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他们是“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汉奸、奸商之上”。政府要向他们征收“资本税”和“临时财产税”。

马寅初的言论，揭穿了“四大家族”的丑恶嘴脸，击中了他们的实质和要害，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蒋介石恨不得立即抓住马寅初亲手杀了他，方解心头之恨。但是，一来慑于马寅初的威望，二来马寅初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老师，怕遭到世人的反对，只好采用软的一手。

一天，马寅初的寓所里来了一位政府要员，对马寅初“和善”地说：“马先生，蒋委员长非常‘敬重’您这位老师。为了您的研究，他特地安排您到美国去进行‘经济考察’，至于您去美国的一切费用，政府全包啦！这可是个上等的‘美差’哟。”

马寅初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回去告诉蒋介石，国难当头，我决不离开祖国！”

来人碰了一鼻子灰，夹着尾巴走了。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事隔不久，此人又来到马寅初家。见到此人，马寅初讥讽道：“你这次来，又带来了蒋介石的什么旨意？是不是让我走遍世界、旅游观光啊？！”

“不、不、不，蒋委员长让我转达说，当前时局严重，战时经济也难搞。他请您任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两个职务随您选哪一个都可以。”

马寅初“笑咪咪”地说：“好啊，这可都是‘肥缺’啊！”

“可不是，多少人都眼巴巴地盯着这两个职位呢！”

只见马寅初笑脸一收，怒目圆瞪，严肃地说：“你去告诉蒋介石，对于他的‘恩赐’我不领情！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我马寅初重申我的诺言，一不做官，二不发财！”

马寅初拒绝了蒋介石的利诱，继而又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在战时的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武人在前方流血，文人不惜死于后方”

正在马寅初继续向社会呐喊之时，蒋介石扯下了伪装，向他下了毒手。

1940年12月6日的清晨，马寅初的住宅被宪兵包围，以蒋介石要召见马寅初“调往前线考察经济”为名，强行将其架走。商学院的师生们知道马先生此去凶多吉少，于是学生自治会决定：立即召开全校学生“援救马寅初”大会。8日上午，马寅初在宪兵团长的“陪同”下回校办理移交。消息一传开，师生们不约而同地汇集在一起，要求马寅初作临别赠言的讲演。马寅初登上讲台，看着台下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激动万分，继续滔滔不绝地揭露“四大家族”的罪行。最后他说：“如果让我给大家赠言的话，那就是：为了抗日，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不惜死于后方。”

马寅初的演讲赢得了师生们一阵热烈的掌声。宪兵团长忍耐不住了，气

极败坏地说：“马先生此次是奉命到前方考察经济的，时间紧迫，要赶快动身。”一边说，一边威逼马寅初离开会场。马寅初挺胸昂头，从容不迫地走了。师生们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蒋介石找的一个借口而已。于是自动在道路两旁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个个眼含热泪，目送他们的院长出了校门。

马寅初被捕了。先是关在贵州息峰集中营，后又转押到上饶集中营。

1941年农历3月30日，重庆大学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文化界的一些名人如沈钧儒、邹韬奋来了，新华社以及重庆各大小报社的记者们来了，一些驻渝的外国记者也来了。

校内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大事件？没有。

这一天是什么节日？什么节日也不是。

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寿联、寿幛挂满了四壁，正面的墙壁上“明师永寿”4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闪闪发光。这里正举行着“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本来马寅初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九，为了祝愿他早日出狱，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抗议，重庆大学的师生们就把马寅初的生日提前到了这一天。

在各界著名人士的一再呼吁下，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马寅初终于在1942年8月被释出狱。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给他规定了“三不准”，即不准任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又把他软禁在歌乐山大木鱼堡的家里，一直到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

1946年1月，重庆大中小学生一万多人，举行示威反对内战。65岁的马寅初没有被国民党的“铁窗”和软禁所吓倒，他又组织起了100多人的教授队伍，加入了游行的行列。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寅初恨之入骨，又开始了对他的迫害。这时他受黄炎培之邀，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在上海他又积极投身于学生为抗议美军暴行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的行列之中。

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邀请马寅初作一场演讲，他欣然接受了。蒋介石得知后非常害怕，于是又故技重演，派人给他送来了请柬，邀请他赴宴。来人对马寅初说：“自始至终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即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这次请您一是叙旧，二嘛……还是想请您出任财政部长。”

马寅初微笑道：“他是想弄个官位把我的嘴巴封住，办不到！”

蒋介石听后，恼羞成怒，密令尾随马寅初的特务，公开发出威胁：“马寅初敢到南京演讲，就干掉他！”

马寅初非常了解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到就能做到，有多少爱国志士不就是倒在他的枪口之下！为了民族的利益，他把个人的生死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临去南京前，马寅初立下一份遗嘱，交给了家人。

他如期达到南京，作了《穷则变，变则通》的演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当发现会场里有特务在骚动时，他愤然地说：“我晓得人群里有特务，正用手枪瞄准我的胸膛，我不怕，要怕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慑于马寅初的胆略和正气，以及学生们“特务滚出去”的强烈呼声，藏在暗中的特务不得不悄悄地溜出了会场。

中国共产党非常关心、爱护马寅初，为了他的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

织于 1948 年，让他化装成厨师离开上海，假道香港又转辗到东北，最后安全到达北京。

（胡鸿鹤）

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少年时，名耆年，字寿昌，以后改名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索村。其父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23岁就去世了，母亲因感伤过度，生下李大钊不到16个月，也随继去世。先失家严，再失仁慈，李大钊自幼孤苦伶仃，为一垂老之祖父李如珍抚养成人。李如珍也是个读书人，因没有儿子，将侄儿李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子。李大钊出生时，祖父已70多岁了，但对这个孙子却宠爱备至，管教也十分严厉。

李大钊从3岁起就开始学字，四、五岁便学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7岁到本村谷家的学塾单子鳌先生那里读书。10岁到本村赵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念书。后又到井家坨的举人赵某家跟黄玉堂念书。16岁考入永平府中学。李大钊10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了婚，夫人赵纫兰，比他大6岁，是个贤惠的妇女。

1907年夏，李大钊考取了天津的北洋法政学校。1912年6月，他写了第一篇文稿《隐忧篇》，同年冬他曾去北京，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3年创办《言治》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哀篇》，同年暑假，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返回故乡，筹划出国日本。1913年冬天，李大钊得到友人的资助，东渡日本，次年考取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研究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6年李大钊未等到毕业，就于4、5月间回到上海，投入国内的反袁世凯运动，6月，由上海去天津，创办《晨钟报》担任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1917年担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1月，李大钊正式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年10月，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和李大钊一块工作，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11月15日，李大钊在天安门前的演讲大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说《庶民的胜利》，开始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列主义者转变。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和陈独秀轮流编辑《新青年》杂志，其间和鲁迅建立了崇高的战斗友谊。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的《每周评论》创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1919年9月，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1月全文刊载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研究。1920年初，李大钊与邓中夏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夏秋之间，李大钊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最早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者和领导者，是北京党组织的创建者，他的一系列活动，对我们党的成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被选为中央委员，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李大钊受党中央的委托，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23年2月，李大钊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6月，出席了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1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同毛泽东、林伯渠一起出席了国民党一大，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临终前指定李大钊为国民

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5月，由于张国焘的叛变出卖，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暂避五峰山。6月，接中共中央通知，委派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的“京师警察厅”逮捕，4月28日，他昂首走上敌人的绞刑台，发表了最后的演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促进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一生著作甚丰，共发表文章360余篇，诗歌20余首，创刊编辑杂志或小报8种，在其领导下出版的刊物4种。其著作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除此之外，也有同机会主义者论战的，有唤起民众起来革命的，还有杂感、游记之类。1939年出版了一本《宁常文集》，鲁迅先生为该书作序，但该书立即被当局封禁。解放后又出版了《守常文集》，并出版了《李大钊选集》。

在李大钊众多的论著中，影响最大的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土地与农民》。

《庶民的胜利》是著名的演说，《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光辉的论文，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着重指出：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阐述得还不很完备，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很准确，但它毕竟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因此，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土地与农民》中，李大钊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了必须依靠贫雇农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指出了应变旧式的红枪会为新式的农民武装。在农民问题上，李大钊和毛泽东同志是站在一起的。他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被毛泽东同志编入《农民问题丛刊》。

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1917年，列宁领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并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了演讲大会，李大钊阔步登上讲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光辉论文。他的演讲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青年》杂志从第五期开始，成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他一方面积极地组织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稿子，一方面积极着手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我国人民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青年》第五、六两期载完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当时在中国最早的

也是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领导五四运动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五四运动前期，他一面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一面竭力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本质，在思想上为五四运动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同时，李大钊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中去开展工作，积极组织各种进步团体，在组织上为五四运动作了准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这一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对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行径，感到无比愤慨，于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在天安门集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开始了。5月5日，大专院校学生罢课。6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7日，长辛店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此时，李大钊及时指出，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能抱任何幻想，要把斗争进行到底。6月30日，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创建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为党的成立作了干部方面的准备。在北京，以李大钊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1920年初，李大钊曾与邓中夏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3月，李大钊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长乌廷斯基在北大图书馆里又进一步讨论了建党的问题。乌廷斯基根据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认为：中国组织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李大钊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于4月在北京开始了建党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利用大学讲坛和报纸刊物，更加系统地介绍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0年9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小报。1921年7月，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13人，代表53名党员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26年，段祺瑞所谓的“执政府”对李大钊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最后终于发出了“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发惩办”的狂叫。他们视李大钊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通缉捉拿，密探间谍，千方百计地侦探他的住处。

李大钊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下巧妙地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有少数人动摇了，害怕了；他却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毅然把北

京革命的全副重担挑起来。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郊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李大钊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象一把高擎的火炬，照耀着北方革命人民前进。

1927年4月6日清晨，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等处，实行了疯狂的大逮捕。这天正好是清明节，李大钊正在伏案写字，忽然传来枪声。他坚定沉着，刚从抽屉中拿出手枪，敌人就冲入室内，夺下了他的手枪。李大钊被捕了。

李大钊在监狱中，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敌人为了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机密及名单，用尽了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里，剥去了他双手指甲。李大钊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未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表现了他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高度的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威逼不成，敌人改用高官厚禄来利诱。敌人的诡计遭到了李大钊的痛斥。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对李大钊处以绞刑。李大钊拖着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的沉重身体，带着凛然不屈的威严目光，含着坚定的笑容，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第一个从容、昂然地走上绞刑台。临刑前发表了最后的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战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牺牲时，年仅38岁。李大钊牺牲了，而我们的耳边，永远回荡着他那充满信心的坚定的声音：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修平）

文学家——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字佩弦。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1916年在江苏第八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读书后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他为早期会员之一。1923年3月发表了长诗《毁灭》，引起当时诗坛的广泛注意。192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文集《踪迹》。

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开始研究古典文学，并致力于散文创作，其散文名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绿》等，艺术构思缜密谨严、抒情写景委婉细腻，语言格调清新秀丽，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深深抹上了作者的感情色彩，使文章充满了诗情画意。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散文家。1931年留学英国并漫游欧洲大陆，次年回国后出版了《欧洲杂记》和《伦敦杂记》。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中，他随清华学生上街游行。抗战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几年内完成《新诗杂话》、《诗言志辩》、《国文教学》等学术著作。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各界人士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他毅然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1946年10月返回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各项民主运动，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这期间写了不少文艺论文，分别收入《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集子。他贫病交加，却不向反动派屈服，不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赞扬他有骨气，“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948年12月病逝北平，享年50岁。

朱自清著作有27种，近200万字。尤以散文成就最高。其作品大都收入《朱自清散文集》和《朱自清诗文选集》中。

探索人生

“五四”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短暂而又特殊的时期——当封建的锁国的障壁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塌之后，伴随着屈辱和愤恨，中国人民面对的是滚滚而来的西方思想文化浪潮。随着这股强大的冲击力，中国的新文学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在历史的震颤中诞生了。风雷激荡的伟大时代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新潮诗人，他们探索人生、探索社会、也探索着祖国的自强之路，朱自清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

1919年，朱自清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其间“和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等建立了很好的友谊”（陈竹隐《记佩弦》），受其进步思想影响，一向以温雅沉稳著称的朱自清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大潮中奋起了。他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道，走上北京街头，参加爱国示威大游行，希望能在“前面一片荒郊”中踏出一条路来。学生运动的浪潮冲击着他的思想，激荡着他的心灵，沸腾的生活唤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朱自清拿起笔，探索人生，剖析社会，歌颂光明和理想，鞭挞了腐朽和黑暗，开始在诗歌园地里展露他的才华。后来，当别人询问他的创作为何开始于“五四”时期时，朱自清曾不无自豪地

回答：“这是时代为之。”

不久，朱自清同叶圣陶、俞平伯等一起创办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这之前他还参加了“新潮”社，为《新潮》杂志撰稿，——这是一个继“文学革命的发难者”《新青年》后，在当时具有全国影响的进步刊物。从此，他便活跃于中国的新诗坛，成为一个著名的新潮诗人。他的诗既有一时感兴的小诗又有节奏明快的短诗，既有繁音复节的长诗又有表现哲理思索的散文诗，这些诗作以独特的思想色彩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

朱自清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作当首推《赠A·S》，这首诗以昂扬的激情描绘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和飒爽英姿：

你的手象火把，
你的眼象波涛，
你的言语如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你飞渡洞庭湖，
你飞渡扬子江，
你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
我想你是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
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

这里，作者歌颂的是革命者建立共产主义“红色天国”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并且把这种理想同推翻旧世界的“黄金王宫”联系在一起。全诗感情激越，意境宏伟，一系列恰切而深情的比喻表现了诗人对革命者发自肺腑的赞颂。一般诗评家均认为此诗是为邓中夏而作，但似乎不应狭隘如是。仔细体察全诗意境，就会发现这首诗绝不仅仅是对某一个革命者的赞颂，而是一曲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颂歌，因为诗中已明显地具有了社会主义倾向，表现出作者对新时代的强烈向往。

如果说，《赠A·S》只是体现了作者社会主义思想的觉醒和对革命者的赞颂，那么，在《送韩伯画往俄国》里，这种觉醒和赞颂就变更得更加成熟而明朗了。此诗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把新生的苏联比喻为清晨照耀大地的“火一般的红云”，在诗人的笔下，那瑰丽的红云“不住地燃烧，不住地流动”，把“天光还早”时“黑漆漆的大路，照得闪闪烁烁的”。一个“绘画的学徒”——勇于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代表，在社会主义的“红云”即将驱散黑暗，把整个世界照亮的伟大时刻，“赤裸裸地从大路上向红云跑去了”，作者满怀希望地祝福他，希望他“将在红云里偷着宇宙的密意，放在你的画里”，学到十月革命的经验，将来去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通过这种生动而又形象的刻画，作者真诚地真露了自己所追求的美好而伟大的政治理想。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种政治思想的具体含义诗人也许知之不多，但他的这种探索人生道路，向往光明前途的宏伟志向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朱自清不愧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虽不是我国最早的白话诗，但在当时的诗坛上是“比较更多地摆脱了旧诗词的束缚，使新诗向前跨了一大步”。他的长诗《毁灭》，“是五四以来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水平的力作。”（王瑶先生评语）朱诗明快、朴实、深沉柔美，不仅深得同代人喜爱，而且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郑振

铎先生曾赞扬他的诗功力深厚，“是用了全力来写作的”。

可以说，朱自清在五四新诗园地里辛勤耕耘、大胆探索，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为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名字将在新文学运动史册上永放异彩。

大义凛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告诉人们：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的后半生，目睹民族的灾难而饱经忧患，伴随祖国的危亡而历经沧桑，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战争硝烟的熏灼又使他和苦难中的劳苦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使他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成长为一个坚韧不屈的民主战士，受到了伟大领袖的赞扬。

1938年，中华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成立，朱自清毅然走出了安居执教的大学校园，担任了协会的理事，从事抗敌文艺运动，并踊跃参加各种抗战爱国活动。大后方虽无战场上的硝烟烽火，却有灵魂中的血肉拼搏。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他和一批批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共同走上街头，走向民众，组织文艺演出和集会游行，发表演讲，宣传抗日主张，歌颂抗敌将士。热烈的场面，动人的情景，经常使他热血沸腾，他为民众的觉醒感到由衷地高兴，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即将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参加“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会以后，朱自清在短文《这一天》中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从两年后的这一天看，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火光中成长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发自内心的无比欣喜和兴奋之情。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奉行不抵抗主义，现实的发展远不如朱自清所希望的那般美好。在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但黑暗的现实更激起了朱自清的抗战热情，“他认为抗战第一，个人生活苦一些不要紧。”（《忆佩弦》）当时，他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经常披着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从乡下进城去上课。对于学生的正义行动，他尽全力予以支持，且更加关心人生，关心社会，关心现实问题。“事实在教育着他，他的高度的正义感也促使他认识事实的真象，重新考虑问题。”他说：“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轻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快走。”（陈竹隐《忆佩弦》）他在政治上自觉地抛弃了中间路线，勇敢地站到了人民革命阵线一边。1942年初西南联大学生掀起了倒孔（孔祥熙）运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朱自清不仅坚决支持，而且称赞学生的“游行秩序良好，人数众”，显

示了民主力量的声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消息传来，朱自清兴奋异常，15日这天，他高兴地和老百姓一起冲向街头，狂欢达旦，回家后，兴犹未尽，拿起笔，手书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但胜利的喜悦不久就被心中的忧虑冲淡了。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迹象愈来愈明显。尽管诗人时刻担心“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打内战”，但国内局势却一天比一天紧张，这种紧张的局势经常使他坐卧不安。1945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屠杀了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大中学生，造成了震惊大西南的“一二·一”惨案。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诗人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他亲临死难学生灵前致敬，并义正词严地斥责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断然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不与群魔同流合污，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格，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爱国者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

1946年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又公然于15日白天刺杀了闻一多。朱自清悲愤到了极点，他在17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为一多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痛斥“此实惨绝人寰之事！”怀着极大的悲痛和愤怒，朱自清疾书《挽一多先生》新诗一首，热烈赞颂闻一多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成都各界人士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当时风传特务将捣乱会场，再次制造流血事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但朱自清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不畏强暴，不向恶势力屈服。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出席大会，作闻一多生平报告，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义凛然地向国民党反动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会后他又召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组成了“闻一多先生遗著整理委员会”。回到北平以后，虽然国民党反动报纸诽谤他，并把他称为黑名单的第一名，但他不怕坐牢，不怕暗杀，仍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在许多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进步宣言和呼吁书上签名，抗议反动当局任意捕人杀人；支持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

1948年春，朱自清重病缠身。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以“但得夕阳无限好，休须惆怅近黄昏”来激励自己勇敢地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朱自清病势沉重，生命垂危，此时此刻，他念念不忘的是坚持自己的民族气节，不向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屈服。他谆谆嘱咐家人“以后坚决不买国民党配售的美国面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的品格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朱自清虽然在贫困中倒下了，但一个坚韧不屈的民主战士的英姿却永远巍然屹立在我们面前。

（王运思）

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189~1946），原名文浚（jùn），出生于安徽歙（shè）县西乡一个贫寒教员之家。六、七岁开蒙，边劳动边在父亲指教下读书，1907年16岁时跳级入徽州的崇一学堂，两年后提前毕业，1909年借资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半年后因不满学校歧视不信教的学生愤而退学。1910年秋在一牧师资助下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此间，受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影响，改名为陶知行。1914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同年，借资赴美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6年获“师范教育总监”学位（硕士）。是年秋回国，不久，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组为东南大学）教授，继任教务长、教育系主任。1919年倡议组织了南京教育界联合会，声援支持“五·四”运动，1920年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1923年与晏阳初、朱其慧等人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本，办平民学校，推进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3月与赵叔愚教授在南京和平门外的一座小山上合刀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简称晓庄师范。1930年4月晓庄师生参加了全市性反帝示威大游行，恼怒已久的蒋介石迅即下令查封晓庄学校，14名爱国师生遭杀害，陶行知遭通缉，被迫逃亡海外。

1931年回国不久，陶行知又逐渐展开活动，组织发起“科学下嫁运动”，着手普及科学教育。1932年10月在上海北郊大场，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为国难教育建立一个新据点。继之，又在沪西北新泾为工农子弟办起晨更工学团秘劳工幼儿园，以及市区的报童工学团等10余处。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陶行知除发表文章探讨教育与社会关系及其改革的文章外，还发起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出版《生活教育》半月刊，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至1934年，他终于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出真知的原理，即正式宣布改名为陶行知。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影响下，陶行知更坚定地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更积极地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此间，他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全国救国会。并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组织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夏，陶行知应邀出席伦敦世界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会委托，任国民外交使节，访问了亚欧美非28个国家。所到之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海外侨胞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38年8月在桂林主持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被推为理事长；同时出版《战时教育》杂志。1939年到重庆后，于7月在北碚的合川凤凰山上一古庙里创办育才学校，收容、教养战时流离失所的难童，其中容纳不少共产党人；他还与李公朴、史良等人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学校课程，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才，并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去革命根据地。1945年春，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更加倾向革命，相信真理，不畏强暴，主持和发行《民主教育》月刊和《民主》周刊。他一直站在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最前列。1946年4月他回上海后，一面筹划育才迁校，一面忙于民盟的工作，到处演讲，为反独裁争民主而疾呼。7月25日，

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 55 岁。

1916 年到 1946 年的 30 年间，陶行知先生倾全部心血于人民教育事业，致力于革新教育事业。早在 1917 年前后，他就提出要用“教学法”代零星“教授法”；晓庄学校办起后，他创造性地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口号，构成其自成体系的“生活教育”论；在民族危亡时刻，他又及时地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倡导“工学团”制，此间，他创立“小先生制”，实行“即行即传人”的普及教育方法，还在农村组织“农友会”，开设文明茶馆。总之，陶行知是一位从我国国情出发，倡导教育改革教育的先驱。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反对旧教育、普及新教育方面，不仅在当时的国内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国外。特别是他后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达到了新的高峰，使“生活教育”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教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珍贵的一页。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总理称他是“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的著作很多，主要的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中国大众教育》、《行知诗歌集》、《行知教育论文集》等，由他主编的刊物有《新教育》、《教育评论》、《平民教育》等。

毕生报国，修筑教育长城

早在美国求学时期，陶行知就确认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迁就新社会的基础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从此立志走“教育救国”之路。下面的小故事就充分体现了他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

1923 年 9 月 12 日，陶行知游览八达岭长城之后，在青龙桥候车之际，遇到安徽同乡刘君。畅谈中刘君说，外国人要买下他收藏的一块明朝永乐年间的长城砖，他拒绝了，现在要执意送给这个刚结识的教育界朋友。盛情难却，陶行知郑重地收下了。随后，他将这块上有“中部”二字的长城砖送给四女师，镶嵌于四女师新建校舍墙基之上，并告知该校师生这块长城砖的来历，勉励他们说，教育是中国强盛的保障，四女师既得万里长城之砖，自能在为祖国造就人才的奠基事业中奋力前行。

为了修筑中国的教育长城，在陶行知 55 年生命道路上，洒下了一路血汗。自 1920 年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到 1927 年开始的晓庄事业、30 年代初的“科学下嫁运动”、1932 年 10 月开始的“工学团”运动，以及生产教育社，再到 1939 年 7 月创建育才学校、社会大学，都是他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1946 年陶行知在去参加“昆明一二·一反内战烈士祭”前夕，他预料蒋介石要对前往参加纪念活动的进步人士下毒手，便给其妻吴树琴立下遗嘱：“我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遗嘱不忘教育，由此可见陶行知毕生为革除文盲多的贫弱国势而矢志普及平民教育、启发民众智慧的抱负与死而后已的精神。

为抗日救亡推行国难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一贯爱国救民的陶行知立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与发起了全国人民救国会，组织了国难教育社。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主张首要任务是把人民大众团结起来，靠人民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解放自己。为此，他将普及教育与抗日救国融合起来，大力开展国难教育，倡导“工学团”制，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先后在上海附近办起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等10余处学校。在农村组织“农友会”，开设六明茶馆，将宣讲国家大事与普及文化、提高觉悟、提高能力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全国乃至东南亚等地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为使国难教育与抗日救亡深入各层人士之心，坚持到底，陶行知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其正义主张，鼓励人们。40年代初的一天，陶行知与戴伯韬等在重庆对岸的南山参观一所学校之际，适逢国民党全国经济资源委员会举行所谓“精神总动员大会”，当他应邀上台即兴讲话时，他一反官老爷们作做之态，开门见山地呼吁：“我们要坚持抗战，一直抗到底，……不要灰心，事不论大小，人不论地位，只要我们坚决干下去，是会成功的。……有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同事以及学生，因为善于趋炎附势而飞黄腾达，不是官商大亨，就是委员、部长、厅长、步步高，……说我没出息，才步步下降，回国时办大学，后来办中学，现在降低使用当小学校长，教小娃娃了。但我是坚持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在任何情形下，就是只让我当一名小学校长，我也要贡献出一切力量来服务，而且很愉快。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他这话博得了教职员们一阵阵热烈掌声，而一些官员则低下了头。

民主战士“等着第三枪！”

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的民主战士，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组成中一直将民主教育置于重要地位，他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时期“奴隶教育太多，主人教育太少”，高呼“民主第一”、“工人万岁”。他主张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遂民之欲”，因此，他在推行平民教育、待人处事、研究学问等方面，均是提倡解放、讲究方法、作风豪放而潇洒。他的行动激怒了反动当局，1930年4月与1936年冬，他先后两次遭通缉。但是他仍临危不惧，表现出了一个民主战士应有的气度和风范。1946年2月10日，在校场口事件中，陶行知目睹特务暴行，非常气愤，号召大家做好用血与生命争取民主胜利的准备。同年4月他从重庆回上海后，一面筹备育才迁校，一面到工厂、农村、学校作反独裁、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的演讲。6月23日上海举行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浩大游行，陶行知站在一条长凳上高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7月11日、15日，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接着传来上海特务的“黑榜”，陶行知名列“探花”（第三），面对反动派的枪口与朋友的劝告，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同时，他在给育才师生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昨这两天有西方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感召一个人来顶补，……只要我们肯为民主死，真正民主就会来到。”一派正义气贯长虹！

然而，未等国民党特务的子弹射来，病魔却夺走了他的生命。1946年7

月 25 日上午，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逝世。生前他曾嘱咐家人，要把遗体运到南京晓庄安葬，“一定要把我的头朝向北方”。表明他至死不忘教育事业以及他那颗磊落光明的心，永远朝着延安，朝着中国共产党。

（陈立峰）

文学家——郭沫若

(1892~1978)，四川乐山沙湾镇人，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坚贞不渝的革命家，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号尚武。1916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借流经家乡的大渡河的支流雅河的别称——沫水和若水之名，取了郭沫若这个笔名。

郭沫若青年时代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在中小学读书阶段就阅读过《三国演义》、《西厢记》、《庄子》、《史记》等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民主运动，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屡次参加反对国腐败政府的学潮。辛亥革命时，他在同学间带头剪掉象征民族屈辱的辫子，在反帝反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表现积极。

1913年末，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入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就学，在这里，他先后接触了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文学作品，也受过泛神论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曾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他还和福岗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组织文学团体“夏社”，开始了初期的文学活动，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宣传。时代的动荡，革命的兴起，激发了他强烈的诗歌创作欲望，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于1921年问世。这部杰作，以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开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成为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者。

1923年春，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由于思想认识的转变，加之早年所患重伤寒给听觉器官造成的缺陷，他终于弃医就文。1925年在上海通过瞿秋白，开始和党组织进行接触。1926年初，由林伯渠推荐，前往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此，他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并在毛泽东等同志主持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作过报告。1927年3月，他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前夕，向革命阵营发出警报，号召迅速起来打倒蒋介石。他积极参加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曾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匿名参加文化活动，创作了诗集《恢复》，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坚定不移的信念。1928年，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流亡到日本，开始了日本后10年的旅居生活。旅日期间，他一直关心着国内进步文化的进展，积极支持并指导了留日青年的文化斗争与革命实践。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立即回到祖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战期间，他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6部历史话剧和诗集《战声集》，这些作品痛斥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极大地激励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民主斗争。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和香港领导文化界同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及内战阴谋作斗争。作品有《南京印象》、《洪波曲》及其它论文、杂文等。1948年到了解放区。建国后，他长期从事祖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于1951年，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解放后仍不停息地进

行创作，主要著作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东风集》等诗集，还有《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及专著《李白与杜甫》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郭沫若进行迫害，终不能使其折腰，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诗文集《东风第一枝》。

郭沫若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回顾他的生平，最难使人民忘怀的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他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大无畏的革命实践。

为国分忧，赤胆忠心

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8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正当欢腾的心潮在人民胸中翻卷的时候，卖国贼蒋介石却跳出来抢夺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到处派遣接受大员，居然下命令不准新四军、八路军受降，并唆使军阀阎锡山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中国大地、中国人民在一刹那喜悦的闪光之后，又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面对现实，忧国忧民的郭沫若心情沉重，只觉得“天玄而地黄”。他认为只有“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他大声疾呼：胜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和平”，“希望全国同胞共同惕勉”。

在时世艰难的形势下，他谢绝了友辈的劝说没有去上海寻个人的安居，而是留在蜀中坚持斗争。此时，毛泽东将亲自和周恩来、王若飞来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国共两党的和谈。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后，既欣喜又焦虑，因为他深知蒋介石向来是个背信弃义的政治流氓，毛泽东此行的危险性，使郭沫若为之担心和不安。他在心中不断思虑这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安全，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以及中华民族的前程有着何等密切的关连，此时此刻郭沫若把自己忧国忧民的深情全部倾注到毛泽东、周恩来及王若飞这些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了。8月28日，郭沫若偕同于立群亲往机场，欢迎延安来客。至此，郭沫若和毛泽东已十多年没见面了。但当毛泽东从飞机舷梯上一出现，郭沫若立刻就看出这位革命家镇定自若的身影、脸庞和目光。当毛泽东同郭沫若握手时，郭沫若忽然觉得这位体态伟岸的革命领袖的手掌是那样宽大有力，他的眼神充满了问候和关切之情，他带来的是革命的信心和力量。

9月3日，郭沫若接到通知，得知毛泽东要到天官府看望各界人士，心情格外激动。由于交通堵塞，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毛泽东的住处，郭沫若同夫人一起立即赶到红岩村。会见谈话中，说到写诗，毛泽东亲切自然地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他向坐在自己身旁的郭沫若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象写我的生活一样。”接着毛泽东又话题扩展开来，对抗战胜利的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预言了和平的必然到来并对达到这一目的困难作了估计。郭沫若听了很受鼓舞，对在革命的危难之际，伟大领袖的出现，感到欣慰和踏实。郭沫若在和毛泽东十分亲切和谐的交谈中看到这位共产党的主席用的还是一只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手上的表抹下来送给了他。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这件事，他生前一直戴着这只表。郭沫若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诚挚友谊，倾注着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思想感情，激励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

9月9日，毛泽东在红岩村第二次接见各界人士时，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和文化界决不妥协的斗争态度。11月7日下午，郭沫若去青年馆参加中苏文

协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在大会讲话中，郭沫若就面对面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团结，欺压人民的罪行。他义正词严地说：“今天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人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的心是雪亮的！”当时陈立夫、何应钦之流都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台下特务们虎视眈眈。郭沫若面对 1500 余群众，从容镇定，没用一个辱骂和恐吓的字眼，而每一句话都象匕首刺中敌人心窝。一阵抨击之后，郭沫若彬彬有礼地转过身，向陈、何等辈微微点头“致意”，他的这个意味深长而无懈可击的富有戏剧性的动作，寓含着发人深思的讽刺。台下群众与郭沫若的心自然是相通的，故而心领神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弄得丑类们面红耳赤，暗自叫苦不迭。

重庆被黑暗所笼罩，但民众的心中闪着光亮，郭沫若以他为国分忧的赤胆忠心，在敌人面前毫不示弱，并且富有战术性地不断地主动出击。

呼唤和平，正气浩然

1946 年 3 月 4 日，在“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得以释放。这位为和平、正义而征战的人民的将军，竟遭蒋介石的暗算，被关押在狱中长达 5 年零两个月之久。当天晚上，郭沫若即奔赴红岩村看望叶挺，他对叶挺非常敬佩，敬佩他不屈服于恶势力的革命家的意志和气派，敬佩他为和平正义事业而身陷囹圄却毫无个人怨言的品格和正气。两人久别重逢，热烈拥抱，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叶挺首先镇静下来，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吗？‘三年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兑现了。”站在一旁的邓发颇有风趣地“纠正”道：“不行，志固不可夺，帅又何可夺呢？”郭沫若会意地笑了一阵，对叶挺回答说：“当然记得，你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我与你同住在汉口太和街，你还让我把《论语》中的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幅中堂。叶挺恍然笑道：“是的，是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句，你的字好风流哟，内藏劲骨噢！”一阵笑谈之后，郭沫若轻轻地将叶挺让到座位上，退后两步打量了他一阵，看到他虽经多年的囚禁生活，而今仍壮志不移，依旧雄姿焕发，心中暗暗赞叹：真不愧无产阶级的英雄豪杰哟！郭沫若动情地冲口说道：“改日一定请你痛饮几杯，好好地为你重获自由庆贺一番。”叶挺欣然接受，连声说“好的，好的。”

那天，从红岩村回到天官府，已经是深夜，郭沫若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了 3 年前叶挺在狱中亲手制作，送给他的那枚“文虎章”；想起了叶挺夫人李秀文送来的叶挺在狱中写的那首表现革命者高风亮节的诗——《囚歌》，禁不住感情冲动，蓦然泪下。他在幻觉中，把叶挺的诗当作燃烧着愤激、辐射着光辉的作者的形象的化身，通过泪花他似乎看到了叶挺在狱中面对凶恶的敌人，刚正不屈的高大身影。他的朦胧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了，他居然坐起来从珍藏的地方将这首诗拿出，反复地颂读了起来：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读罢，又居然自语起来：“好诗！真够味！”，“这才是真正的诗！”，“是和平战士的高风亮节之歌！”

郭沫若敬仰叶挺有一身浩然正气，因而能在逆境中永不屈服；他钦羨叶挺有高洁的人生观，因而能超越一切困难。他希望全国青年们能读到他的这首诗，并能从诗中感受并学习叶挺这位为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勇战斗的真正革命者的光辉精神！于是他怀着敬意写了介绍文字，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这首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诗。

郭沫若就是这样在反内战的激流中，同革命者一起奋然前进，揭露邪恶，呼唤正义，用战斗的笑，文洒血泪情。

当他得知郁达夫“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消息之后，悲痛至极，愤然命笔：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郭沫若用泪水写成的这几行字，寄托了对革命的文化战士和挚友的哀思，并饱含着“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理这个世界的强烈心愿”。

郭沫若为中国和世界和平而呼喊、奋战，蒋介石的特务时时、处处跟踪、监视他。但是郭沫若早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他经常公开露面，为和平而呼唤，他的浩然正气，震慑着敌人，感召着人民。1946年4月8日，叶挺夫妇以及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于黑荣山不幸遇难。在追悼大会上，他以极度悲痛的心情，如泣如诉地宣读祭文，与会的群众无不声泪俱下。作为一名坚强的和平战士，郭沫若不仅经得起生死的考验，而且也能极力承受战友们死亡的沉重打击。他的悼词，表达了他平生不曾遇到过的沉重的悲伤之情，表达了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对烈士的哀思，更是对和平民主运动的热烈鼓动：

生为民主，死为民主……

民主的的战士们啊，崇高的榜样，

为着争取和平胜利飞往北方，

遇着了雨暴风狂，被挾下降。

这天大的损失啊怎样补偿？

（周兴椿）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

范文澜（1893～1969），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字仲法，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做过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历任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大游行，支持工人罢工、学生罢课。1927年会见过李大钊，受其影响秘密为地下党组织工作。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他是我国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进行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为在新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范文澜曾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又撰有《中国近代史》上编、《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等著作和论文。

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扩大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他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所长。1951年中国历史学会成立，郭沫若当选为会长，他和吴玉章同时当选为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会务。并作为总编之一，主持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他为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还著有《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书，出版了《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著作。

范文澜的后半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从40年代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就拟定了“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原则，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之始。从那时起直到他的晚年，《简编》曾经过多次修订再版，从略到详不断完善，成为众多读者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启蒙读本，在全国影响很大，因而范文澜成为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研究工作中，范文澜学风极为严谨，史学造诣很深，其著作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和自成一家的特色。他在治学中的独创精神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堪为史学研究家的楷模。新中国成立后，他继往开来，率先垂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使它成为一门科学并组织起一支史学科研队伍，为创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1969年4月，范文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7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从教授到革命战士

范文澜出身于旧时代的书香门第，祖父范城，父亲范钟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喜欢读书。少年时代，他就在塾师和父亲的督导下，不仅学四书、读五经，而且还熟读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10余载的旧式书斋生活使他对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由于学制的变迁，他曾先后就读于绍兴“山阴县学堂”、上海“浦东中学堂”、杭州“安定中学堂”等新式学堂。由于新学堂教学内容极为广泛，他接触了许多新的知识，眼界大为开阔。1913年，他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转入本科，专门攻读国学，曾直接受业于我国著名的教育改革家蔡元培先生和以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闻名于当时的陈独秀先生，以及旧学底蕴极为深厚的刘师培先生等著名教授、学者，他对自己的这些师长极为敬仰，师长们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风格都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他以后走上革命征程，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和学术基础。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当时，范文澜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他不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而且深刻地观察和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认识到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勾结，中国人民不得不同时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因此，他开始向往无产阶级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听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召唤，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许多进步活动，并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共产主义理论。在那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反复较量的岁月里，他的进步活动不久就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他不得不被迫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几所大学任教，同时利用自己的教授身份，继续秘密地为地下党组织工作，担任教联、左联、互救会等社会进步团体与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并经常参与进步团体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影响。他的工作为当时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过很好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爆发，激起了范文澜强烈的爱国激情。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和王阑西、稽文甫、姚雪垠等同志一道，创办抗战期刊，宣传抗日主张，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1938年夏，日寇的铁蹄疯狂地践踏着中原大地，党为了领导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急需培训大批抗日救亡干部，范文澜受党的委托到河南组织抗日干部培训班。他亲自编写材料，亲自讲课，为党组织培训了一大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就在这个时期，范文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此他便彻底结束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以一名普通战士的身份，跟随部队在信阳等处开辟游击区，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并奔走于桐柏山一带，到抗战第一线去拼搏、去战斗。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经受了激烈战斗的考验和艰苦生活的磨炼。血与火的洗礼使他们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革命斗争的实践又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他真正完成了从一个大学教授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并以他坚强的意志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同志们的敬重。

从革命战士到学者

1940年，范文澜以一个党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身份，从抗日前线被调往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编撰《中国通史简编》。开始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生涯。他自己曾回忆说：“未去延安之前虽然反复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选集》，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少得可怜……到延安以后接触马列主义的书籍多

了些，学习了干部必读的若干本书，增加了书本知识，就是用这点知识开始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

《中国通史简编》是为延安的一些干部学习文化和学习中国历史用的。编写的宗旨是“揭示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为了写好这部书，范文澜曾专门请教过毛主席。毛主席指示他编史书要“夹叙夹议”，鼓励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历史研究，并且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这些都使他受到莫大鼓舞。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史学资料缺乏，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搜集资料，使《简编》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很快印出了第一版。尽管第一版存在诸多局限，使它毕竟完全不同于旧的历史书籍，它是我国第一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我国几千年辉煌历史的著作。作者曾这样介绍《简编》的内容和编写体例：“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第四，书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朽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被迫起义……对于外来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重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这种写法与旧体历史相比较，无论是在取材方面，还是在观点方面都是一次大胆的变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产物，无异于在旧史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简编》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许多人把它作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启蒙读本。有的读者写信给作者说：“读了《简编》，对祖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从而增强了爱国心，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充满希望。”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把《简编》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认为：“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严禁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简编》几经修订再版，篇幅扩大了4倍以上，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范文澜也成为新中国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除《中国通史简编外》，范文澜还写了大量有关历史研究的论文。如《百家争鸣与史学》、《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等，批判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观点，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范文澜的治学风格极为严谨，对重大历史事件及有关资料总是反复钻研，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在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正确的判断，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在研究了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之后，认为必须用一条线索把这些事件贯穿起来，方有可能认识近代历史的发展和趋向。于是他便从研究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发现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古老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长期的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研究近代历史必须掌握这样一条线索：即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框架，“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

联系和影响”，从而才能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全貌，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范文澜非常重视对理论的学习和掌握。50年代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就谆谆告诫同志们，一定要掌握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才能获得有关这门知识的真正学问，从中得到益处；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来对待；学习和运用要“神似”，决不能“貌似”。当时近代史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史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其立场、观点从事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

范文澜从事史学研究和史学界领导工作几十年，他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的宝库，并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影响着新一代广大史学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和我国一批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把新中国的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科学的新途径。可以说，范文澜为创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付出的巨大劳动，使他无愧于新中国史学奠基人的光荣称号。

（王运思）

戏剧家——洪深

杰出的戏剧家、戏剧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洪深（1894～1955），学名洪达，号伯俊，字潜斋，又称浅哉。出生在江苏武进县（今常州）一个官僚世家。1900年入家塾，1911年前分别就读于上海徐汇公学、南洋公学、天津铃铛阁中学，1912年入清华学校预科。1916年公费留学于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习烧瓷工程，1919年改学戏剧，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曾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其间仍进行戏剧的创作及导演工作。1924年闯入电影圈，与田汉、夏衍等成为挚友，与中国共产党也发生了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敌演出队，坚持抗日宣传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组织教授罢课并积极参加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游行示威，因而惨遭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建国后，洪深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患肺癌于1955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

洪深一生对我国的戏剧、电影及戏剧教育事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五·四”运动前，人们把以对话和歌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剧种，称之为“新剧”或“文明戏”，这是为区别于旧的戏剧而命名的。“五·四”以后，欧洲戏剧传入中国，现代话剧兴起，不过当时并非叫话剧，而称之为“爱美剧”、“真新剧”或“白话剧”。针对这一情况，洪深于1928年建议取消这些名称，改用“话剧”。他认为戏剧不过有两大类，即歌唱与说话的，这种剧是说话的，应叫“话剧”。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戏剧界人士的一致认同，于是话剧这个名称便通行起来。

洪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曾编导过10多部影片，并创办了中华电影学校，训练、培训了一批电影事业的人才。早期的中国电影没有剧本，他的历史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是中国电影艺术的一大创举。他编导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影片。

洪深一生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是其代表作。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研究戏剧、电影的理论文章。他的主要著作都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洪深文集》中。

学戏剧，唤醒国民

1916年，洪深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选为公费留学生，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烧瓷工程。这对洪深来说，实现了他最初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以实业救国的愿望；对他官宦出身的父辈们来说，看着自己的下一代入了正路，也放了一条心。

1919年5月，伟大的爱国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身在异国他乡的洪深，深受国内形势的感染。他想：欲真正拯救中华民族，实业、金钱固然重要，而整个民族的灵魂不改变是不行的。我要用戏剧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唤醒苦难中的祖国人民，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于是改变了他“实业救国”的宏愿，不顾家庭的反对，不顾世俗的偏见，

毅然决然，改学了当时在国内被视为“下九流”的职业——戏剧。

其实，洪深的这一举动，并非仅仅是青年人一时的心血来潮。他自幼就偏爱戏剧，早在清华读书时就创作了《卖梨人》和《贫民惨剧》两出话剧。特别是《贫民惨剧》，在北平东城青年会新述会堂募捐义演时，很多名人都出席观看。许多观众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受到了当时一些进步报刊的赞扬。来到美国后，他在学习陶瓷专业之余，仍然对戏剧有极高的兴趣，阅读了大量的戏剧书籍。1918年他用英文创作了《为之有室》和《回去》两部剧作，特别是前者，以结局上不落当时美国流行的窠臼，在留学生举办的“中华夜”联谊会上演出时，受到了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赏。

1919年，为了配合国内的“五·四”运动，他创作了以欧战史实为题材，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题的英文剧《虹》。《虹》一编出，便得到中国留学生的大力支持，在美国各地巡回演出，获得了成功，该剧的成功，极大地加强了他以戏剧为武器，唤醒国民的决心。同年秋，洪深以《为之有室》、《回去》两部剧作考取了哈佛大学，专攻戏剧编撰。次年，一并涉及舞台设计、剧场管理等各个方面，还在考普莱广场剧院附设的戏剧学校进行了全面的学习。

洪深虽然出生在官僚世家，但对下层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国内学习期间，他就常常与校门的小商贩，拉洋车的人交朋友，不然，绝写不出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贫民惨剧》。1920年，中国华北地区遭受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灾区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一向关心下层人民生活的洪深，在美国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这时他已毕业，并参加了美国职业剧团。为了救赈国内灾民，他辞掉了工作，邀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在纽约、华盛顿等城市演出了由他和教育家张彭合写的多场英文剧《木兰从军》。他任导演，并亲自粉墨登场，所得收入全部寄给灾区人民。

除陋习、创体制、革新戏剧

在美国短短的五、六年间，洪深通过艰苦的自学和专业训练，艺术才智有了极大的提高，在戏剧这个行当中，可以说他“羽毛已经丰满”了。为了实现他以戏剧教化国民的宏愿，于1922年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施展他的戏剧才华，洪深选择了当时文化生活比较先进的上海作为立足点。刚到上海人地生疏，只得暂以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作为栖身之地。工作之余，却按捺不住干戏剧的激情，仍在寻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年冬天，他以反封建反军阀混战为题材，编写了一出需要女角的戏，定名为《赵阎王》。他请了当时小有名气的李悲世、秦哈哈等人来担任角色，自己亲自扮演主角赵阎王。本剧除第一场和第九场外，其余七场全是赵阎王一人的戏。洪深在舞台上时而大声疾呼，时而痛哭流涕，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一个因军阀混战而神经失常的赵阎王。这种独树一帜的表现手法，当时的观众很难接受，因而未能获得成功。

初试锋芒，遭受了挫折。然而，洪深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探索。1923年，洪深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戏剧协社，由于他在当时的戏剧界是唯一的一个受过西方高等戏剧教育的人才，所以担任了排演部主任的职务。当时的话剧舞台，盛行男扮女色，对于这种反串表演的陋习，

洪深真可谓深恶痛绝，总想改变这一局面。由于当时洪深在戏剧界的地位还没有确立，如果把自己的主张公开端出，肯定会遭到指责，甚至非难。

机会终于来了。

1923年9月，协社请他执导欧阳予倩的《泼妇》和胡适的《终身大事》。他经过深思熟虑，想出了一条妙计，事先他不动声色，悄悄请来了女中的学生担任《终身大事》的女角。大幕徐徐拉开，男角男饰，女角女演，男女同台演出，一改旧习，耳目为之一新。全剧结束后，大幕降落时，台下的观众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大幕不得不重新拉开，演员一次次谢幕。压轴戏《泼妇》开始了，女角一如既往由男人妆扮。观众看着台上演员扭扭捏捏地走动，听着演员尖着嗓子的叫喊，才感到十分别扭。演员那种矫揉造作的表演，不时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嘘声、倒彩声此起彼落。

洪深的这在一大胆而有创造性的尝试，震动了上海，震动了中国的剧坛。从此，中国戏剧舞台上男扮女角的陋习才得以革除。

这一次的成功，更增加了洪深革新戏剧的决心。于是在次年由他翻译并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中，在布景、灯光、道具、舞台设置、表演动作、发音技术、化妆服饰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革新，达到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演出不仅哄动了上海，整个中国戏剧界都为之轰动，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话剧的一整套演出体制。

威震“大光明”

1930年2月21日，由外商开办的上海光明和光陆两家戏院，同时上演美国滑稽幽默电影《不怕死》。第二天，洪深同音乐家张曙、电影演员金焰等一起，来到“大光明”观看此片。戏院内万头蠕动，坐无虚席。电影开始不久，银幕上出现了一系列侮辱我国同胞内容的镜头。洪深气愤之极，忍无可忍，大踏步登上前台，挥拳高喊“同胞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怎么能允许放映这种有侮我中华民族的丑剧？凡是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应当站起来抗议，维护我中华的尊严！”

“中国人的都站起来！”张曙和金焰也一起呼喊助威。

在他们的鼓动下，戏院内立刻大哗，观众们纷纷离座有的还高声呼叫：“我们退票，我们退票！”

在一片喧闹声中，电影无法继续演下去了。戏院的灯亮了，经理一边跟洪深等理论，一边暗中派人叫来英、美巡捕，当场把洪深等人押上了警备车。租界当局连夜开庭审讯，戏院内继续上映该片。

这件事激起了一些进步人士和上海市民的强烈不满，一致抗议，要求禁演这类辱华影片。院方经理和英、美巡捕房慑于群众的威力，不得不低头服输。经过洪深等人的据理抗争，结果是：一、《不怕死》影片不再在中国各地放映；二、该片演员罗克用书面向中国人民道德；三、大光明戏院公开登报向洪深等道歉，向上海市民道歉。

斗争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洪深的名字连同他的爱国精神，在人民群众中不胫而走。

洪深不仅对中国戏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早期电影事业中也是一员虎将。

中国电影起步较晚，30年代初中国电影公司还没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大规

模地有声影片制作。美国电影商看到这里有利可乘之机，于是便勾结一些官僚买办，以“中美合资”的名义，筹组什么美国注册联合电影公司，以便大肆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为使美商的这一阴谋昭然于世，洪深于1930年7月21日第一个在《晨报》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办电影公司摄中国片》。文章指出：“这是一个阴谋，如果让其得逞，中国资本的电影不是被挤跨，便是被吃掉，到那时，我们还想做什么反帝的片子？社会革命的片子？而甚至于狭义的爱国片子么？”洪深的这篇战斗檄文一发表，立刻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类似的文章，抗议美商的这一“侵略”行径。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这个联合电影公司的筹备机构，在登报认股后不到一个月便停止了招股，被迫“下马”了。

击败了美商的阴谋以后，洪深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更加卖力了。接连编导了《香草美人》、《铁板红泪录》、《劫后桃花》等反帝影片，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洪深一直活跃在戏剧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个戏剧家应有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他仍然为繁荣和振兴祖国的戏剧、电影事业而进行创作、奔波和操劳，直到耗尽最后的光和热。

（周永祥）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又字浣华，原籍江苏泰州，出生于北京一个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19世纪著名的京剧演员，北京四大徽班之一“四喜班”老板。父亲梅竹芬也是一位优秀的京剧演员。梅兰芳3岁时父亲去世，15岁母亲去世，依靠伯父梅雨田（著名琴师）拉胡琴收入维持家庭生活。梅兰芳8岁开始学艺，师从吴菱仙。11岁登台演出，演青衣，也演刀马旦。梅兰芳自进入梨园后，一直虚心好学，他请教过的京剧老前辈很多，加上他的勤学苦练，因而唱、做、念、打等功夫，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稳固的基础，20岁时便是一位驰名京沪的京剧演员了。

梅兰芳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京剧悠久的优良传统方面，成就卓越。经过了50多年舞台生涯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深广，世称“梅派”。不仅如此，梅兰芳还突破了各种困难，对京剧艺术进行大胆的创新。如1913年，他的剧目中开始出现了《穆柯寨》、《虹霓关》等不属于青衣的戏，打破了过去传统的青衣、花旦等角色分行的限制。再如1922年，梅兰芳和徐兰沅、王少卿一起，在京剧的配乐中增加了二胡，使演出伴奏的音色丰富起来。在梅兰芳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上演的传统剧目数以百计，创演的的新戏共有30多出。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曾先后担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59年在他65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1年8月8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梅兰芳除了演戏外，业余时间很喜欢绘画，并进行戏剧的研究工作。196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把他生前所撰写的论文编为《梅兰芳文集》出版发行，另有自述传记《舞台生涯四十年》等。

蓄胡须罢演明志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大部分的领土以后，侵略的魔爪又伸向香港。这时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正留住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后，梅兰芳悲愤至极，怒火中烧。为了表达他心中对祖国大好河山深深的爱，对日本帝国主义无比的仇恨，他这个戏剧舞台上的花旦，愤恨地扔掉了他每天都离不开的剃须刀。没过几日，浓黑的胡须就挂在了他那副“美女”的脸上。对于他这一反常的举动，妻子疑惑不解，可是看到丈夫近日脸色老是阴沉沉的，只有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也不便多问。幼年的儿子梅绍武却不懂得这些，好奇地问：“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不刮胡子您怎么演戏呀？”

梅兰芳轻轻拍了拍儿子的头，回答说：“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又占领了香港。我想他们肯定要给我给他们演戏的，爸爸留起了胡子，日本人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听了梅兰芳的解释，小绍武懂事地点了点头。一旁的妻子也疑团顿开，朝着梅兰芳会心地笑了。

果然不出梅兰芳所料。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夏威夷

群岛瓦胡岛上的珍珠港，以微小的代价，获得了大的胜利。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日军驻香港司令酒井找到了梅兰芳，要他为其演出。当酒井看到梅兰芳的胡子时，由吃惊而转为气恼，蛮横地说：“梅兰芳，你的不要以为留起了胡子就可以逃掉了，胡子统统地刮掉，马上登台！”

梅兰芳对酒井司令的蛮横不屑一顾，义正辞严，回答说：“我年龄已大，嗓子也退化了，就是辞掉胡子也是断然不能登台的！”

就这样，梅兰芳不顾日寇的淫威，坚决地拒绝了日方的要求，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心，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民族自尊心。

梅兰芳想，这一次是逃脱了，但日本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香港决非久留地，为了个人及全家安全，他又回到了上海的家——梅花诗屋。

回到上海后，他深居简出，除了几个朋友外，一般客人很少接待。停止了演戏也就没有了收入，仅靠以前的一点积蓄很难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梅兰芳的业余爱好是绘画，曾与画家齐白石有很深的交往，并拜师学艺。过去的业余爱好，这时派上了用场，他时常在书房里的台灯下作画，拿出去卖，添补生活开销。梅兰芳在戏剧舞台上的名声可以说是誉满中外，而在画坛上却成了“无名小卒”，所以仅靠卖画是入不敷出的。上海几家戏院的老板，看到梅兰芳的生活日衰一日，便纷至沓来，请他复出，可是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为了生计，他宁愿把祖辈留给他的北京住宅卖掉，也决不登台演出。

施巧计再拒登台

1942年的年底，一直杜门谢客的梅花诗屋，突然闯进了一个上海滩上的大人物——汪伪政府的褚民谊。

“梅兰芳，我受大日本帝国和汪主席的委托，前来请你立即组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作巡回演出，以庆祝‘太平洋战争胜利’一周年。”褚民谊盛气凌人，一进门就开门见山以命令式的语气说明了来意。

看着这个民族的败类，梅兰芳强压着满腔的怒火，用手指了指满腮的胡须，沉着地说：“我已经上了年纪，早已退出舞台了。再说，好久没登台了，也没吊吊嗓子，使不得，使不得！”

褚民谊见强硬不行，又生一计，梅老板，听说你近来日子过得可不怎么样啊，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大日本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你要能演出，这个嘛……会大把大把地装进你梅老板的腰包。”说着做了一个点钱的动作。褚民谊了解到，梅兰芳因停演而生活上发生了危机。心想：你梅兰芳再清高，再有骨气也不会不想钱的，我这一着准灵。褚民谊窃自得意，坐到椅子上点燃了一支烟，翘起二郎腿，吞云吐雾，悠然自得。一会儿他见梅兰芳没有反应，进一步劝说道：“梅老板，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哟，钱可是个好东西呀！只要你肯演戏，胡子嘛可以刮掉，至于嗓子，吊吊不就行了。哈，哈哈……”

梅兰芳气愤至极，忍无可忍，讥讽道：“我听说你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也唱得很不错，我看你组个剧团，亲自当团长去慰问就很好，何必非我不可呢？”

是啊，日伪政府为什么三番五次非要让梅兰芳为他们演出呢？

这里边除为了欣赏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外，更主要的还是想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想借着梅兰芳之名，显示日本人的淫威。早在1929年冬到1930年春季，梅兰芳就率团到美国作过访问演出。在美国他不但结识了著名艺术家

卓别林、范朋克、罗伯逊等，跟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荣获了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所以，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不仅在国内声誉颇高，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样一位国内外大名鼎鼎的人物，来为日本人庆祝胜利，这在国际上不更能显示“大日本帝国”的威风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梅兰芳早就看透了，加上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仇恨，所以坚持拒绝演出。

褚民谊看到金钱也不为梅兰芳所动，便露出狰狞面目，恶狠狠地说：“梅兰芳，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告诉你，明天你必须去演出，如若再违抗，大日本皇军要以军法论处你！”

褚民谊走了，梅兰芳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正在他无计可施之机，一位同他一样具有爱国之心的医生朋友来访。各自落座，寒暄一番。医生看到梅兰芳满脸愁云，便问：“梅先生愁眉不展，莫非又为生活发愁？”

梅兰芳摇了摇头，道：“日子过得苦点倒没什么，哎……”

“莫非是贵体欠安？让我来看看，我的医术……”

医生以后的话梅兰芳一句也没听进去，唯独对“贵体欠安”发生了兴趣。只见他眼睛一亮，喜上眉梢，把褚民谊来他家的经过和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对医生讲了，最后说：“医生，您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医生说：“办法倒有一个，只是梅先生要吃一点苦头。”

“不怕，不怕！只要能瞒下日本人，吃再大的苦我也不怕！”梅兰芳坚定地说。

医生敬佩地看着梅兰芳，悄悄地讲出了他的办法……

第二天，日为伪政府派来一帮凶神般的爪牙，硬逼梅兰芳去演出。只见梅兰芳脸色苍白，浑身哆嗦，语不成声，“我……我病成这……这样子，怎么能……能演戏？”

“病啦！哼！我看你是装病吧。快把军医叫来，检查！”

不一会儿日本军医来了，经过认真检查，梅兰芳体温已达40℃，确实有病。这样日伪政府才不得不作罢。

原来，他的这位医生朋友给梅兰芳打了一针预防伤寒的疫苗，致使体温上升，才得以瞒混过去。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梅兰芳才刮掉了胡须，再度登台。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再度焕发青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他组织了“梅剧团”深入到厂矿农村，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仅1951年到1955年就演出500多场，观众达100多万人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梅兰芳不顾65岁的高龄，排演出《穆桂英挂帅》，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塑造了一个爱国女英雄的形象，表达了他对祖国深深的爱。

（周永祥）

音乐家——刘天华

著名音乐家，教育家，琵琶、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翻译家刘天华（1895~1932），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09至1911年在常州中学求学时，刘天华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开始学习吹军号及军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常州中学停办，刘天华返回故里，参加青年军乐队，从此开始从事音乐工作。1912至1924年，赴上海参加沪西开明剧社，在乐队工作。这一时期，刘天华又学习管弦乐器、钢琴等西方乐器，尤以铜管乐器他学得最好。1914年，沪西开明剧社解散，刘天华再次返回故里，在华墅华澄任教。1915年，其父病逝，刘天华也因病失业。第二年秋天，任教于常州母校。在任教期间，组织了军乐队及丝竹合奏团。1916年，与殷尚真女士结婚。1917年，从师周少梅先生，专门学习琵琶和二胡。1918年夏，从师沈肇洲先生，学习琵琶。就在这一年，刘天华开始创作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二胡名曲，并写成初稿。1920年夏天，赴河南省学习古琴，教授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等曲。1922年赴北京，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第二年秋天，又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同时学习三弦拉戏。1923年，从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直至罹病，从未间断。1924年，名曲《月夜》定稿。1926年，除了北大与女师外，又任教于北京艺专，同时创作《苦闷之讴》，并学习昆曲。1927年，学习作曲理论，创办国乐改进社，编辑音乐杂志，创作歌舞引、引进操、悲歌。1928年，创作《除夜小唱》、《闲居吟》，公开发表《空山鸟语》。1929年，创作《虚籁》。1930年，听写梅兰芳剧曲册。1931年，在高亭公司灌制二胡独奏《病中吟》及《空山鸟语》，琵琶独奏曲《歌舞引》及《飞花点翠》。1932年，创作《独弦操》及《烛影摇红》。6月1日，赴天桥收集锣鼓谱，染上了腥红热，得病仅一星期，于6月8日凌晨逝世，享年37岁。

刘天华虽然一生短暂，但其著作甚丰。译著有《和声学》、《曲调配和声法初步》；二胡独奏曲有《月夜》、《除夜小唱》、《闲居吟》、《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烛影摇红》、《二胡练习曲集》（含曲47首）；琵琶独奏曲有《改进操》、《虚籁》、《歌舞引》、《琵琶练习曲》（含曲15首）；丝竹合奏曲有《变体新水令》、《混江龙》；歌曲有《君永校歌》；二胡独奏灌音片有《病中吟》、《空山鸟语》；著作汇编有《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创办的刊物有《音乐杂志》。

执著追求，振兴国乐

清末民初，当社会上还看不起音乐的时候，刘天华对音乐早已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青年时期，排除一切困难，赴沪学习军乐，并立志振兴国乐。刘天华家庭经济始终艰难，然而他却安贫若素，常对妻子说：“丈夫惟患事业之无成，家有贤内助，贫困何足虑？”为了振兴祖国的音乐文化，1927年，他克服种种困难，一手创办了宣扬国乐和音乐教育的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由于刘天华家境贫寒，他虽有其心，每难如愿，音乐杂志被迫中途停刊。

为了宣传国乐，从1922年起，刘天华先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

年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音乐系的课程，1926年再兼任北京艺专的课程。暑假期间，他积极组织国乐研究社，传授技艺。1927年，他积极创办了国乐改进社。

尽管刘天华兼任3所高校的课程，教学任务繁重，但每有登门向他求技的青年人提出要求时，均一一答应，并热心指教，耐心辅导。有时甚至留徒在家共进晚餐。对于学生，他非常诚恳，不论智愚，一概尽力施教。对于不甚聪明的学生，尤其多下功夫，直至教会；对于聪明而不用功的学生，毫不客气，有时甚至责骂；对于挨过骂而立刻用功的学生，他便立刻加以表扬。

刘天华不仅施教严谨，而且自学勤奋。一有空，他便深入社会，收集乐谱、皮簧、昆曲、锣鼓、小调、大鼓等，无所不听，无所不写。夏天的晚上，他常邀街头卖唱的乞儿宴之宾堂，请其弹唱，肃然静听，默然记写，蔼然详问，有得必笔之以书。为了听写“吵子会”的锣鼓谱，他跑到天桥下流艺人汇集之地，身染猩红热，以致以身殉乐。

精湛乐技，震惊中外

刘天华的乐技，造诣极深，精通甚广。林之棠在悼念刘天华时写道：“先生岂惟精琵琶，提纲铜角无不明。纳中西共铸一炉，卓今古独创新声。”可见刘天华的乐技造诣之深，神通之广。

当时的北平，凡举行音乐会，刘天华必定登台演奏。他的演奏无人不受人赞美。民国十九年深冬的一个晚上，刘天华在北京饭店举行个人音乐会。当时天气十分寒冷，普通室内，滴水成冰。刘天华音乐会的内容有二胡、琵琶、古琴等。在狂风怒吼，飞沙走石的当儿，北京饭店的门口仍是车水马龙，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大厅里挤满了中外音乐爱好者。刘天华教授一登台，全场的兴趣、渴望、惊奇顿觉增加，火焰一般的兴奋充斥大厅。当时最受欢迎的演奏是二胡演奏《空山鸟语》、《病中吟》；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德雷兴先生听了刘天华的演奏惊叹不已，连声评论道：从刘先生的演奏中，我听到了离别的涕泣，步伐的节奏，兵刃的响声，思慕的微叹，病人的呻吟，幽林里的鸟语。刘天华教授演奏一停，顿时掌声四起。很多外国音乐爱好者，纷纷跑入后台，向刘天华握手道赞，并以一见风采为荣。

北京饭店演奏会后，德雷兴先生竭力怂恿刘天华教授多灌唱片并介绍给高亭公司。仅灌两片：一片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和《病中吟》；一片琵琶独奏曲《飞花点翠》和《歌舞引》。今天我们所能听到的刘天华先生演奏的曲子仅此两片。实际上，当时最受人欣赏的是《汉宫秋月》和《十面埋伏》等曲，只以此曲太长，需片太多，公司为了营业，无意灌制长片。

爱国爱乐，拒绝外邀

刘天华教授临死之前不久，一位外国女音乐家正式邀他到美国去开音乐演奏会，刘天华断然拒绝。好多人不理解，到美国演奏，可发大财，问他为何不去，他说：不去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点：我自己的技术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作曲的内容，还不丰富。第二点：这个外国女音乐家钢琴的演奏技术，并不出人头地，到了美国，不但不能把国乐的优点充分地代表出来，反倒带累了国乐，使它在国际间，不能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凡有损国乐声誉的事，给

多少钱我都不干。国乐声誉是头等大事，10年之后，有了充分的准备，再去不迟。不去则已，一去必须使国乐在世界上占有光明的地位。他对自己是何等的求全；他对国乐是何等的负责；他对国誉是何等的看重！

举办音校，振兴国乐

1927年，在刘天华直接领导下，国乐改进社成立，音乐杂志创刊。时隔不久，艺专音乐系及北大音乐专科相继停办，当时音乐界的人士，无不疾首痛心。同时，刘天华还看到，当时社会上，有一批有志于音乐的人，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入正规的音乐学校学习，致使一批有音乐才能的人被埋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闹了音乐饥荒导致的。怎么办？坐等是没有用处的。强烈的振兴国乐的心，终于使刘天华想出了办法——办夏令音乐学校。

当时的国乐改进社，人力物力都很薄弱，办正规音乐学校是不行的，只好利用暑假，办业余音乐学校。办学的宗旨是，供中小学音乐教师和中学以上的爱好音乐的学生学习。办学的学制，大约需要4个暑假，修满100分可以毕业。开设专业科目，主要是音乐专业的各门功课。学习时间，每年的7月1日，至9月10日。学费愈少愈好，每年不准超过15元。所需校长和教员，从国乐改进社中聘请。办学房舍，由国乐改进社筹备。所需乐器，除钢琴外，一律由学生自备。所需经费，除收学费外，不足之数由国乐改进社补助。

刘天华的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国乐改进社的同志的赞同，受到社会上音乐界的好评，大家都希望刘天华的意见当年暑假就实现。

（李修平）

绘画艺术家——徐悲鸿

徐悲鸿（1893~1953），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县人。他从6岁开始跟父亲读书识字，9岁读完《四书》、《五经》，10岁跟父亲学画，勤奋刻苦，后留学法国，考取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来又向法国著名的绘画大师达仰学画。曾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苏联展览。192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北京艺术学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屡以己作在国外展售，得款救济祖国难民，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建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徐悲鸿在绘画创作上，提倡“尽精微、至广大”。对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他擅长国画、油画，尤精素描。人物造型注重写实，传达神情。所画花鸟、风景、走兽，简练明快，富有生气。尤以画马驰誉中外。绘画能融合中西技法，而自成风格。曾创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富有进步思想的历史画，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重用奸小，不识人才进行含蓄讽刺，讴歌人民力量，表达抗战必定胜利的信念等等，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染力。

作为一个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始终把培养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放在个人的创作之上。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甘当伯乐，发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美术人才。他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和南京中央艺术系，主持艺术教育的工作。他不仅教学生绘画技巧，还注意引导学生走正确的艺术道路。三、四十年代，他经常对留学生讲“国外学习很不容易，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回国后，要承担起中国美术教育的重任”。徐悲鸿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他们为我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3年9月25日，徐悲鸿因病逝世，终年仅58岁。

为中华雪耻

1919年春天，徐悲鸿怀着实现复兴中国美术事业的雄心壮志，踏上赴法留学的新征途。

到法国后，徐悲鸿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接受严格的素描基本功训练。一次偶然的机，徐悲鸿认识了法国当时最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达仰。达仰很喜欢这位努力而俭朴的中国青年，于是收徐悲鸿作自己的学生。同时，徐悲鸿认真研究了欧洲的艺术传统，以及各个画派的风格和特色，逐渐掌握了油画艺术的精髓。

当时，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威望，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因此也常受到些外国人的歧视和侮辱。在学校的一次留学生聚会上，有个法国学生站起来傲慢地说：“中国人愚昧无知，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去深造，天天让达·芬奇手把手地教，也成不了材！”

这个法国学生家中有钱有势，平时狂妄自大，对中国留学生蛮横无理，现在又出口伤人。徐悲鸿被激怒了，他用威严的目光盯着那个法国学生说：

“先生，你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试比试，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一定要为中华雪耻，为民族争气，让中国的绘画艺术在世界艺术的领域

中大放异彩——成为徐悲鸿奋斗的目标。他象一匹不知疲倦的千里马，日夜奔驰在绘画艺术的殿堂里。

座落在巴黎塞纳河畔的芦浮宫，是一座藏有丰富的古代和现代雕塑、绘画作品的美术馆，被誉为“世界艺术的熔炉”。这里收藏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象磁铁般地吸引着徐悲鸿，激起了他努力、奋发、创新和赶超的信念。每逢学习空隙，他就到美术馆观赏和临摹历代大师的作品，有时一画就是几个小时，连饭也顾不上吃。天长日久，他得了胃病。剧烈的疼痛，使他难忍，他就用左手使劲按住胃部右手不停地画下去。

由于国内局势动荡，经济萧条，留学生的公费时断时续，没有保证，生活十分艰苦。有时候徐悲鸿只能以一杯白开水，两片面包充饥。即便如此，遇到喜爱的书籍、图片，徐悲鸿总要从微薄的生活费用中挤出钱来购买。

3年过去了，徐悲鸿的艺术才能迅速得到提高。在数次竞赛考试中都名列第一。1924年，他的《远闻》、《怅望》、《箫声》、《琴课》等油画在巴黎展开，轰动了整个巴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时，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他找到徐悲鸿说：“徐先生，我承认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看来我犯了一个错误，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就是‘有眼不识泰山’。”

不屈从恶势

1929年秋，徐悲鸿结束了8年的旅欧留学生活，回到思恋已久的祖国。他发誓要为振兴中国的美术事业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四·一二”事变后的中国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背叛革命，使中国人的苦难更为深重。徐悲鸿作为当时非常有名的画家，并没有陶醉在自己的功名享乐之中。目睹眼前的现实，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有一天，徐悲鸿正在作画，他的老同学张道藩推门进来。这位当了国民党大官的同学一进画室，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递给徐悲鸿，开门见山地说：“悲鸿，蒋委员长快过50大寿了，想请你这支生花的妙笔为他画一张肖像，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徐悲鸿两道又黑又粗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早就深恶痛绝，一听要他为蒋画像，便冷冷地说：“我从学画以来，还没有对着照片画过人像。画这类画，上海城隍庙不少店铺画得既象又快。你往上海跑一趟，肯定会使你满意的。”

不等徐悲鸿说完，张道藩的脸已涨得象个紫茄子。他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居然敢不给蒋……蒋委员长画……”

徐悲鸿坚定地说：“我就是不画，你把照片拿去！”

张道藩再也装不出笑脸了，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老同学，你不画，后果是不难想象的！这可由不得我。”说完，拂袖而去。

得罪了蒋介石、张道藩这帮人，可不是件小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徐悲鸿非常清楚这一点。然而，当他看到自己桌上的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感到心里坦然、痛快了许多。

寻找艺库瑰宝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程中，曾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艺术家，他们的传世杰作是中华艺术宝库里光彩夺目的瑰宝。但是，由于外来侵略者的掠夺和国内局势的动荡，许多国宝或流落国外，或毁于战火。这使得徐悲鸿感到十分痛惜。

一次，徐悲鸿到南洋办画展。路过香港，一个偶然的机，他从一个名叫马丁夫的外国人那里看到一幅唐代的白描人物长画，画面有 87 个列队行进的古装人物，神态各异，飘飘欲仙，故名《八十七神仙卷》。那优美的造型，生动的体态，流利而富有生命力的线条，展现了我国古代人物画的杰出成就。徐悲鸿看到后，被其艺术魅力倾倒，他迅即以高价买下此画。徐悲鸿拿到《八十七神仙卷》，比得了宝贝都高兴。这天夜里，他先后起来几次，拉开电灯，展开画卷，慢慢地欣赏，嘴里不住地说：“真是百看不厌的珍品、神品啊！”

1942 年，徐悲鸿从缅甸回国，途经昆明。有一天，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他匆匆忙忙躲进了防空洞，警报解除后，他发现《八十七神仙卷》在混乱之中被人盗走了。丢了这幅画，徐悲鸿像被人当头猛击了一拳，感到头昏目眩。他日夜焦急地到处打听画的下落。但是，一连几天过去了，仍杳无音信。

直到一年以后，有人从成都的一个地方发现了《八十七神仙卷》的踪迹。经过一年多周折，徐悲鸿花了 20 万元巨款托人到成都买了回来。

当“八十七神仙”安然无恙地出现在眼前时，徐悲鸿激动地流着眼泪，两手颤抖着题诗庆贺：“徐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葑菲味，挨到金丹凡骨安。”

解放后，徐悲鸿以满腔热情投入新的生活。走上了表现革命生活，为人民服务的辉煌的艺术之路。正当他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宏图添色加彩之时，由于在旧中国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活所致，他已经多种疾病缠身。1953 年 9 月 23 日，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他脑溢血再次复发，经抢救无效，于 9 月 25 日逝世。

徐悲鸿逝世后，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周恩来总理亲笔为纪念馆写了“悲鸿故居”的匾额。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同志根据徐悲鸿生前的愿望，将他的作品 1200 余件和他节衣缩食购藏的历代名画 1200 余件以及 10000 多种图书资料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

（张建一）

出版家——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江西余江县人。192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23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并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主编《职业教育丛书》。自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致力于新闻出版工作。早期倾向改良主义。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阻止英美势力向华北扩展，出兵侵占山东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邹韬奋从《生活》周刊第33期开始，连续两个多月，刊登大字口号：“时勿忘暴日强占济南的奇耻”。这一年11月，他在“小言论”的专栏文章中，首次用“韬奋”作笔名，取其意为“韬光养晦，奋斗不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邹韬奋从群众抗日运动中受到锻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即到国外考察。1931年出版了《小言论》第一集。1935年8月回国，将国外考察的文章集成《萍踪寄语》出版。同年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7月，与沈钧儒、陶行知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月间在他主持下《生活日报》副刊《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单独出版，这时还出版了《大众集》和《坦白集》。11月22日，与沈钧儒、史良等爱国领袖在上海被捕。他在狱中写了《经历》、《读书偶译》，并补写了《萍踪忆语》最后8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出狱，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到汉口将《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报》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由他和柳湜主编。1938年出版论文集《再厉集》。1939年初出版了他翻译的《苏联的民主》、《从美国看到世界》。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反共、内战的阴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人士的打击迫害日益加剧，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分支书店除重庆一处外全部被封，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他在参政会内外，据理力争，向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抗议，均告无效，遂于1942年2月辞去国民党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这时出版了长篇史料集《抗战以来》和论文集《对民主的抗争》。1942年10月到苏北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1943年秘密赴上海就医治病。1942年在病中开始写作《患难余生记》，未及完成于1944年7月病逝，年仅49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其遗书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周恩来指出：“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复旦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韬奋全集》、《韬奋的流亡生活》、《邹韬奋年谱》等。1958年在上海建立了邹韬奋纪念馆，该馆于同年选辑了历年来悼念韬奋的文章，汇集成《韬奋的道路》一书出版。

唤起民众

“邹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这是周恩来同志在1945年9月12日写给邹韬奋夫

人沈粹缜信中，给予邹韬奋的高度评价。

邹韬奋，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的政治家和出版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坚定而鲜明地喊出激励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走向革命的口号：“爱我们的祖国。”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永安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1921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市圣约翰大学，后经黄炎培介绍，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从此他走上了曲折坎坷的出版之路。

1926年的金秋10月，刚过而立之年的邹韬奋，怀着一颗热爱人民、关怀青年，真挚而火热的心，以全部精力投入编辑《生活》周刊的工作。办刊伊始，邹韬奋确定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把力求把“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作为“最根本的要策”。除了发表文章揭露反动军阀、官僚政客、残酷资本家外，也希望当局能借鉴外国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走国家富强之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侵华气焰甚嚣尘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使邹韬奋彻底看透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在刊物上直载了当地提出了民族前途的中国政治出路问题，他明确指出：“剥削了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正是邹韬奋的思想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生活》周刊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前沿”阵地。该刊大量刊登抗日救国、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反映东三省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英勇反抗斗争的文章，吹响了唤起民众，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斗争的号角。9月26日出版的《生活》第6卷第40期，邹韬奋打破了每期一篇“小言论”的常规，一期发了4篇，呼吁全国人民“应彻底明了国难真相”，“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并在《本周要闻》中痛述“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

同时，邹韬奋还用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日寇攻占黑龙江，东北军马占山部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抗战，饷尽援绝。1931年11月15日，《生活》周刊社在《申报》、《时事新报》和《生活》上同时刊登《为筹款援助黑龙江健儿紧急启示》，热烈支持马占山部奋勇抗日的正义行动，指出“调军支援，责在政府，竭诚助饷，义在国民”，号召全国人民捐款助战。当时这一义举轰动全国，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半个月收到12.98万元。11月28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等6卷第49期上发表《政府广播革命种子》，愤怒斥责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的反动行径，指出这是在“积极地广播革命种子”，警告说：“民众为自己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拼命。”

绝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

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全国邮寄。当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进行解释，蒋介石两次加电一定要禁止邮递。后来又有人向蒋介石“疏通”此事，蒋介石拿出一厚本合订起来的《生活》周刊，上面凡是批评国民党的地方都

已经用红笔划出来，并表示“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邹韬奋和全体同事一起，想尽各种办法冲破封锁。对上海市的订户派出十几个人分送，外邮受禁，依靠在铁路、轮船、航空等交通机关做事的许多《生活》周刊读者，把大捆大包的刊物运送出去，使《生活》每期发行数达到了15.5万份。

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结束了海外27个月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11月初筹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主张，积极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特别对“一二·九”运动，《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起以绝大部分篇幅反映这个运动，连续刊登了不少照片和北京《关于学生救亡运动的报告》，并发表评论给予热烈支持。

这一切，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蒋介石先是派复兴社书记刘健群与CC系头目张道藩到上海找邹韬奋“谈话”，威胁利诱，妄图让他屈服。邹韬奋义正辞严，驳斥了他们散布的谬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要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救亡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绝对不是一、二个人或少数人的脑壳所能创造捏造出来的，所以，即使消灭一、二个‘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要上海的杜月笙出面，“亲自陪送”邹韬奋到南京“当面一谈”，蒋介石还令戴笠届时亲自到火车站“迎接”。邹韬奋与救国会其他同志慎重讨论之后，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言而无信，因此决不能去。当邹韬奋把这个决定通知杜月笙时，杜月笙很不痛快，又无可奈何。戴笠奉命“迎接”，也扑了个空，归途中翻了车，弄得全身污泥，十分狼狈。

事后才知，所谓“当面一谈”不过是蒋介石玩弄的把戏以“面谈”为名，行扣留和软禁之实。3年后，张群无意间泄露了这个秘密，就是要邹韬奋去做“陈布雷第二”。后来，邹韬奋明确表示绝不作“陈布雷第二”。

为抗战奔波呐喊

邹韬奋拒绝南京之行，蒋介石十分恼怒，对他的迫害日见加剧。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生活日报》，同时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他更坚决地拿起“报纸”这个自己的武器，在苦难中对黑暗势力继续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创刊词里，邹韬奋指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生活日报》每日销售两万份左右。回到上海不久，又与沈均儒、李公朴等6位救国会领导一起被捕，被非法监禁8个多月。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爱国入狱案”。1937年1月间，邹韬奋等7人作好了长期羁押的准备，商定“7个人是一个人”，并讨论了必须采取的原则和主张。邹韬奋说，“假使来了不测之祸，把我们几个绑出去枪毙，我们一致的回答也应该一致地从容就义，我们出去的时候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临刑时应该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邹韬奋被推为7个人的“监察”。在后来几个月的审讯和拘押期间，邹韬奋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救国，驳斥敌人的诬蔑攻击。在苏州的监狱里，他异常勤奋地写作，陆续写出了《经历》、《萍踪忆语》等著作。

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

发表宣言，指出“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民党政府迫于抗日形势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不得不宣布释放救国会 7 位领袖。邹韬奋出狱后，只用了 5 天就筹备出版了《抗日》三日刊，同时出版 6 天一期的《抗战画报》，为抗日救国广造舆论。

1938 年 6 月 19 日，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怀着一腔热诚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分子欣然参加。在 7 月 6 日汉口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邹韬奋接连提出了 3 个提案，利用这个讲坛宣传“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把国民党蒋介石两面派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由于邹韬奋所主持的生活书店接连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查封及职员被捕，于 1941 年 2 月，邹韬奋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生活书店领导中心秘密移至香港，开辟抗日救国的新战场。在香港他复刊了《大众生活》，并发表《抗战以来》的长篇史料集，表示了誓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4 年 7 月 24 日，邹韬奋因病重不治，溘然长逝，年仅 49 岁。邹韬奋逝世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他提出的入党申请，革命圣地延安两千多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追悼大会，朱德、陈毅、吴玉章等讲话。同日《解放日报》以 4 个版面的篇幅，刊载了“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发表了多篇纪念文章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题词。中共中央向他家属发出的唁电指出：“邹韬奋先生‘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张建一）

文学家——茅盾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曾用玄珠、郎损、方壁等近百个笔名。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1927年发表《幻灭》时始用茅盾笔名。茅盾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8岁入镇立小学读书，课余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开始对古典文学发生了兴趣。14岁进嘉兴中学读书，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因其积极宣传辛亥革命，反对学监而被校方除名。1913年又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916年因家庭生计所迫，辍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从此，年轻的茅盾便开始了漫长而辉煌的文学生涯。

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发起人之一，并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对该刊物进行了全面革新，使之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此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并翻译介绍了一部分外国文学作品。1921年春，他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是最早的党员之一，成为我国新文学队伍中最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随着革命的发展，茅盾积极奔走，为革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茅盾进入了文学创作的丰盛期。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茅盾不得不四处奔走，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茅盾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蚀》还带有悲观消极情绪的话，那么《虹》的发表就表明了茅盾已开始脱离暂时的迷茫向光明的未来前进了。1930年4月茅盾回上海后，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行政书记，为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和发展左翼文艺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上也颇有建树，他的《鲁迅论》、《冰心论》等作家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专题研究的开山之作。现实主义巨著《子夜》和优秀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及《林家铺子》则代表了茅盾时期文学创作的最大成就。它不仅是茅盾文学创作思想和艺术成熟的标志，也是其登上现代文学高峰的标志。尤其《子夜》，它不仅是茅盾的顶峰之作，也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里程碑。瞿秋白称赞“这是中国第一部写现实主义成功的长篇小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茅盾虽然辗转各地，但他始终是和党站在一起，以笔代枪与侵略者及一切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并积极参与了党领导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过《烽火》、《文艺阵地》等一些刊物，并创作了《腐蚀》等5部长篇小说和其他散文、杂文等。抗日战争胜利，他又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者进行了新的战斗。1948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回到北平，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文协”（后改为“作协”）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历届人大代表等职务，致力于文艺界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为新中国培育文艺新生力量，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十年浩劫中，茅盾虽历经磨难，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一颗赤子之心，他以自己的行动显示了对党、国家和人民的耿耿丹心和浩然正气。粉碎“四人帮”后，茅盾不顾年事已高，仍辛勤耕作，以残年余力散发着自己最后的光和热。

1981年3月27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茅盾因病在北京逝世，应他生前要求，党中央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笔耕生涯 60 余年的茅盾，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一生首先是同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对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学发展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他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构制了一幅现代中国社会的宏大历史画卷；另一方面，他的创作和评论又凝聚着中国人民对现实和未来的深沉思索和不懈追求。诚如王若飞同志所说：“茅盾先生的最伟大之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大时代的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创作的中心内容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相联系着的。”

今天，茅盾——中国文坛上的一颗巨星，虽然陨落了，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许许多多的爱国爱党的动人事迹也一直在人们中间流传，激励着后人前进。

反对外强，为罢工奔波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声讨日本纱厂枪杀工人顾正红的大罢工，爆发了“五卅”运动。随即，茅盾积极主动地参加党发动的全市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为“三罢”而奔波鼓动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罢工。他不顾监视，冒着被捕的危险，亲自参加示威游行活动，进行宣传发动工作。6 月 4 日同韩觉民等 30 余人发起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亲自起草了大会的宣言，指出“五四”以来学生救国的声浪日高一日，但我们的教员大多数始终不曾积极参与过救国运动，甚至还用种种方法压抑学生的这种运动，或是设法使他们沉寂下去。并号召，以后要和学生和各界一同起来救国，不但现在的条件要得到彻底解决，以后还要和学生结合，永远做救国运动的带头人。随后茅盾便以实际行动表现了自己的决心，及时地处理好救国同志会中各种复杂的事务性工作。

6 月，茅盾又同杨贤江、侯绍裘一起针对江苏省教育会所发起的上海各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了谈话，指出关于学潮善后问题的主张太浅，范围太窄。于是发起教职员同志会，以教职员个人为单位从事救国运动。并及时为同志会起草宣言，指出他们这一辈人所负的责任，一方面要以普通国民的身份，率先参与救国运动，另一方面要以教育者的身份，领导那些受自己教育的青年人为救国而活动，同时强调这是他们这些人多少年的希望，只是因为受学阀，所谓名流的蒙蔽，一时趋于苟且偷安，才没有表达自己的愿望。于是特别指出现在时机成熟，因此号召人民起来救国。在这之后，茅盾又积极组织参加了救国同志会的演讲团，向人们讲述“五卅”事件的外交背景，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血腥罪行，鼓舞人们奋勇前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剥削。茅盾在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在为适应斗争需要而办的《公理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五卅”惨案的真面目，使得各界人士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去。

争取平和，搞统战联合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夺取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茅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丑恶行径感到愤慨，毅然挑起了文艺界民主统一战线的重担，为维

护祖国和平和民主而奔波。

1946年3月中旬，茅盾离开重庆，到上海去组织上海文艺界的统一战线。16日，抵达广州，他顾不及行程的劳累，便满怀信心地参加了由广州文艺界联合举行的一次公开欢迎会。面对着会场上那满满的渴望民主、渴望祖国和平和发展、爱好文艺的青年，茅盾的心激动了，他从面前这些青年人身上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同时也增强了要把这些青年们调动起来的责任心。在“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这个题目下，足足讲了两个小时的话，号召文化新闻界力争应有的合法权利。在说到当前的文艺运动时，他说：“战时，我们实行的是抗日统一战线，现在是民主的时代，我们也要实行民主统一战线。凡是赞成民主的，都可以合作，只要有反动派、法西斯分子，我们就反对。今后文艺运动的方向，主要的还是大众化的工作，要使文艺真正为人民了解和接受，使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家。”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态度、立场和愿望。当有人为他去上海的安全表示担心时，他说：“怕什么？难道要把自己反锁在屋内，眼看着那些不知耻的家伙双手把我们国家捧给外国人不成？那自己连同小屋子不也就被送给外国人了吗？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用自己的笔来解救自己，来解救自己的国家。”是啊，想到党的关怀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又怎能吝惜自己的这块崩肉呢？他打算从重庆沿长江东到上海。党组织考虑到不利于他安全的因素，决定他由广州、香港然后到上海。他对党的关怀非常感激。他决定，既然组织上让我绕广州、香港，那也好，我正好把广州香港也动员起来，以免空了缺。在他的积极影响下，广州的气氛很快高涨起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得更响了。

看到这一些良好的进展，茅盾没有在广州很久地停留，很快地向香港进发。4月14日，他和夫人一起来到香港，把文艺界的民主统一战线又带到香港。茅盾深知，香港虽然不属于大陆，但在革命的运动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里非国统区，文化界的红人老人也不少，况且活动相对自由一些，因此能否把这些人团结起来是很重要的。另外，国民党反动派也很重视这个地区，面对共产党倡导的民主统一战线，他们也建立了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对付，对于中间人士，他们拚命骚扰，同时也影响真正坚持民主的人们。针对这种局面，茅盾告诫大家要明辨是非，他幽默地说：“象我，他们也来做过一番统一战线的。他们没有人写得出文章，但跑腿的人却有的是，此外，他们还有钱。”茅盾主张文艺界应该象抗战初期那样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强国而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分析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没有一点旅行的悠闲，短短几天后，他便同夫人一起撑船离开香港到上海。

激励后辈，临终捐巨款

1980年秋季的一天，茅盾把儿子和儿媳叫到跟前，深切地说：“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而长篇小说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更是一个国家文学艺术发展水平的标志，可是我国的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而我自己是以写长篇为主的，这里有我的一份责任啊！”说到这里，老人的心情激动了，他微微闭上眼睛，沉思着。多少年来，作为文学界公认的泰斗，他不但自己坚持不懈地为繁荣祖国的文学艺术而创作，更是目光如炬地在文苑中搜索人才，视培养新人、激励新人为己任。1958年，在围绕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轩然大波中，

他亲自撰文保护杨沫。同年，他在《延河》上发现了一位新秀茹志鹃，撰文推荐了她的《百合花》。1961年，他撰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一九六年短篇小说漫评》挖擢了一大批新人，介绍给读者们……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在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写了一大批给青年读者的复信。在这些信中，凝聚着他对文学青年的深情和厚望，使祖国的文学事业有了坚强的后盾，成为文苑中一棵荫庇新秀的参天大树。可是长篇的创作不够繁荣，使他感到有愧于祖国。他也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为祖国的文学事业再次作出努力。想到这里，他抬头望了望儿子和儿媳，他们似乎没弄清他说话的意图。茅盾接着说：“前几天，作协酝酿了一个关于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拟议案，征求我的意见，我极力赞助。”说到这里，儿子和儿媳明白了爸爸的意图，当即说到：“您是不是想用您的稿费设立文学奖金？那好，爸爸，我们完全支持，绝对开绿灯。”看到孩子们心领神会的神态，茅盾的心坦然了。

1981年3月14日，已经卧病很长时间的茅盾自知病将不行了，他让儿子扶他起来，先是给党中央写了一封要求恢复自己党籍的信，然后让儿子代笔写了一封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信，把自己所得稿费20万元捐献出来，作为一个单项文艺奖金的基金，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两封信都抄写好，他颤颤巍巍地举起那支笔，那支如椽之笔，凝重地在前一封信上署名：“沈雁冰”，后一封信署名“茅盾”，然后放下笔。凝视着这两封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过了很长时间，他嘱咐儿子道：“这两份遗嘱要在我死后再交给组织。”13天后，这位文学巨匠的心停止了跳动。

（岳喜良）

